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管

CHINESE CADRES REFERENCE

# 党政干部参考

## 习近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 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0周年。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迈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第一步，至关重要。第一步要迈准迈稳，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统一战略基点与战略方向

2021年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

百年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变革

坚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2021. 2



# 春

丰子恺

“春！”你听，这个音读起来何等铿锵而惺忪可爱！这个字的形状何等齐整妥帖而具足对称的美！这么美的名字所隶属的时节，想起来一定很可爱。好比听见名叫“丽华”的女子，想来一定是个美人。

春的景象，只有乍寒、乍暖、忽晴、忽雨是实际而明确的。此外虽有春的美景，但都隐约模糊，要仔细探寻，才可依稀仿佛地见到，这就是所谓“寻春”罢？有的说“春在卖花声里”，有的说“春在梨花”，又有的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但这种景象在我们这枯寂的乡村里都不易见到。即使见到了，肉眼也不易认识。总之，春所带来的美，少而隐；春所带来的不快，多而确。诗人词客似乎也承认这一点，春寒、春困、春愁、春怨，不是诗词中的常谈么？不但现在如此，就是再过个把月，到了清明时节，也不见得一定春光明媚，令人极乐。倘又是落雨，路上的行人将要“断魂”呢。

实际，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是从暮春开始的。到了暮春，方才冬天的影响完全消灭，而一路向暖。就景色上说，春色不须寻找，有广大的绿野青山，慰人心目。古人词云：“杜宇一声春去，树头无数青出。”原来山要到春去的时候方才全青，而惹人注目。我觉得自然景色中，青草与白雪是最伟大的现象。造物者描写“自然”这幅大画图时，对于春红、秋艳，都只是略蘸些胭脂、朱磬，轻描淡写。到了描写白雪与青草，他就毫不吝惜颜料，用刷子蘸了铅粉、藤黄和花青而大块地涂抹，使屋屋皆白，山山皆青。这仿佛是米派山水的点染法，又好像是Cézanne（法国画家）风景画的“色的块”，何等泼辣的画风！而草色青青，连天

遍野，尤为和平可亲，大公无私的春色。花木有时被关闭在私人的庭园里，吃了园丁的私刑而献媚于绅士淑女之前。草则到处自生自长，不择贵贱高下。人都以为花是春的作品，其实春工不在花枝，而在于草。看花的能有几人？草则广泛地生长在大地的表面，普遍地受大众的欣赏。这种美景，是早春所见不到的。那时候山野中枯草遍地，满目憔悴之色，看了令人不快。必须到了暮春，枯草尽去，才有真的青山绿野的出现，而天地为之一新。一年好景，无过于此时。自然对人的恩宠，也以此时为最深厚了。

讲求实利的西洋人，向来重视这季节，称之为May（五月）。May是一年中最愉快的时节，人间有种种的娱乐，即所谓May-queen（五月美人）、May-pole（五月彩柱）、May-games（五月游艺）等。May这一个字，原是“青春”、“盛年”的意思。可知西洋人视一年中的五月，犹如人生中的青年，为最快乐、最幸福、最精彩的时期。但东洋人的看法就与他们不同：东洋人称这时期为暮春，正是留春、送春、惜春、伤春，而感慨、悲叹、流泪的时候，全然说不到乐。东洋人之乐，乃在“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新春，便是那忽晴、忽雨、乍暖、乍寒、最难将息的时候。这时候实际生活上虽然并不舒服，但默察花柳的萌动，静观天地的回春，在精神上是最愉快的。故西洋的“May”相当于东洋的“春”。这两个字读起来声音都很好听，看起来样子都很美丽。不过May是物质的、实利的，而春是精神的、艺术的。东西洋文化的判别，在这里也可窥见。

（摘自《艺术人生》，花城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CHINESE CADRES REFERENCE

# 党政干部参考

**主管**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主办**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承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图书和文化馆  
**出版** 《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总编辑/社长** 于 军  
**副总编辑** 闫翠翠  
**本期责编** 秦 虹  
**封面设计** 公 兵  
**责任校对** 高全来  
**设计制作** 北京九州艺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杂志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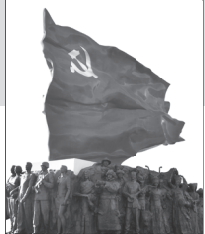
**邮 编** 100091  
**电 话** 010-62805451  
**邮 箱** cankaoccps@126.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5922/C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5-6142  
**国内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2-490  
**广告发布登记证** 京海工商广登字20170156号

**零售价** 25.00元

**月刊 2021年2月28日出版**

2021.  
总第290期 **2**



# 目 CONTENTS 录

<b>要 论</b>	4	习近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b>本期关注·“十四五”开局</b>		
	6	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 王一鸣
	8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统一战略基点与战略方向 / 刘 伟
	10	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 / 马建堂
	12	· 相关阅读·北京：“十四五”时期完成六大发展目标与十二项任务
	13	· 相关阅读·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基本实现
	14	· 相关阅读·上海：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15	· 相关阅读·重庆：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b>经济观察</b>	16	2021：中国经济从结构性复苏向全面复苏转换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19	2021年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 / 刘 昆
	22	进一步发挥消费在扩内需中的基础性作用 / 钱克明
	24	放眼全球：世界经济有望迎来复苏曙光 / 张宇燕
	26	· 相关阅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
	27	互联网新经济良性发展需实施有效监管 / 王思寒
	29	乡村振兴战略的“四重超越”特征 / 王红艳
<b>政治论衡</b>	31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 《求是》杂志评论员
	33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 张 明
	34	基层干部在危机治理中要防止陷入路径依赖 / 王 培
	36	稳固与兴旺是边疆治理的历史必然 / 许建英
	38	周代乐政的确立及价值内涵 / 付林鹏
	40	百年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变革 / 李 滨
<b>文化建设</b>	42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需把握好四对“关系” / 高长武
	44	中国文化建设理论主题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 曹润青 冯鹏志
	47	“解构凡尔赛”的社会文化症候 / 周思妤
	48	· 相关阅读·凡尔赛 / 凡尔赛文学
	49	二十四史的由来 / 黄金生
<b>民生关注</b>	51	走向共同富裕 要做好五件事 / 李 实
	52	促进灵活就业 拓宽就业渠道 / 张成刚 张 岩
	54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国际经验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 翁仁木

- 56 “公共户”背后的政策理性与温度 / 盘和林
- 生态文明** 57 生态环境领域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 庄国泰  
59 实现“碳中和”需坚持系统思维 / 刘满平  
60 蓝天保卫战升级 臭氧将成“十四五”治理重点 / 李 禾  
61 · 相关阅读· 臭氧的前世今生 / 王 姣
- 全球治理** 62 坚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 李忠杰  
64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 何 哲  
67 探索管控中美矛盾的路径 / 傅 莹  
68 警惕美国涉疆涉藏的“舆论陷阱”和“话语圈套” / 王云芳
- 干部论坛** 69 年轻干部怎样做群众的贴心人 / 孙爱军  
70 在重大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 熊 伟  
71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杨英锋
- “四史”学习·庆祝建党100周年专栏**
- 72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73 张太雷——打破旧世界的惊雷 / 丁佳文  
74 新中国“一五”计划的诞生历程 / 吴跃农
- 书摘·书评** 76 假如林黛玉有中年 / 海 龙  
77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 朱光潜
- 科技视野** 78 软体机器人令科学家着迷
- 健康之友** 79 突聋来袭 如何才能远离 / 王宁宇
- 信息窗** 80 2021年1月党内法规要闻  
80 2021年，这份“民生清单”要收好！  
80 浙江：“浙食链”——从田头保障到舌尖  
封三 江西：首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  
封三 四川：出台《四川省市县重大经济事项决策规定（试行）》  
封三 云南：“云菜”直达粤港澳大湾区
- 撷英咀华** 封二 春 / 丰子恺

#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 开好局起好步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8日下午就做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的重点工作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0周年。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迈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第一步，至关重要。第一步要迈准迈稳，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

习近平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全党全国要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开拓前进。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部门层面，无论是省级层面还是省以下各级层面，在贯彻落实中都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把新发展

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切实解决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工作中都要予以关注，使之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不能畸轻畸重，不能以偏概全。从中央层面来说，要从规划设计、宏观指导、政策法律、财政投入、工作安排等方面对全党全国作出指导，抓好关键环节，通过重点突破带动贯彻新发展理念整体水平提升，从全局上不断提高全党全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各部门既要按照自身职责抓好新发展理念涉及本部门的重点工作，也要综合考虑本部门工作对全党全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作用和影响。各地区要根据自身条件和可能，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又抓住短板弱项来重点推进，不能脱离实际硬干，更不要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

习近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

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向着更远的目标谋划共同富裕，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

习近平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又要通过深化改革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现在要把着力点放到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系统集成、精准施策上来。要在已有改革基础上，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把改革推向深入，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

习近平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

国内，放眼世界，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对我国的影响，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反弹。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善于预见和预判各种风险挑战，做好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预案，不断增强发展的安全性。

习近平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只有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无论什么时候，该做的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顶着压力也要干；该负责的，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冒着风险也要担。发现了问题、发现了问题的苗头就要及时处理，不能麻木不仁，不能逃避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各项工作责任制，科学排兵布阵，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尽忠职守、主动作为，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摘自2021年1月29日“新华网”）

# 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

王一鸣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明确2021年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这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

## 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2021年，全球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要求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不急转弯。当前我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宏观政策边际调整要把握好时度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提质增效和增强可持续性基础上，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完善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在促进科技创新和调节收入分配上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对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可适度接续，延期还本付息等纾困政策应有过渡性安排，适当延长普惠小微企业信贷支持计划实施期限。精准有效实施宏观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好就业形势监测、预警和应对预案，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人群，完善就业政策工具，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迈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第一步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从供给端着手，坚持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使供给结构更好适应需求特别是消费结构的变化；又要从需求端发力，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供需平衡。

面对疫情带来的后续影响和我国需求恢复滞后于生产的新形势，党中央提出了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工作要求。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注重需求侧管理，要针对制约我国需求潜力释放的结构性问题，以体制机制建设为主要途径，打通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和梗阻，补齐制度性短板，有效释放国内需求潜力。

过去一个时期，我国需求侧管理在调节投资需求、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控体系，但在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调控手段较为有限。随着我国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明显下降，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构成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着力点。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1.2万亿元，约为6万亿美元，接近美国6.2万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加强需求侧管理，要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新型消费体现消费变革和结构升级的方向，是引领消费的重要力量。要鼓励发展新型消费，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促进新型消费扩容提质。拓展投资空间，增加有效投



资，对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结构具有重要作用。要继续推进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设备更新，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 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展开经济工作

2021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起步之年，经济工作要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来展开。从宏观层面来看，需要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当前，个别国家频频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要加快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整合优势科技资源，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强化源头技术供给，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主体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产业技术创新平台，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形成优良的创新生态。推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推动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加强科技开放合作，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使我国成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重要舞台。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性。**要统筹推进补链、强链，下决心推动国产替代，培育可替代的产业链，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提高供应链安全性和可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四基”技术和重要产品技术攻关与工程化，并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

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改造传统产业，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制造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储蓄、投资的重要制度性因素，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具有再分配功能，对引导消费、储蓄、投资具有重要作用。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

**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加快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保障体系。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立重大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加强社会预期管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金融、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摘自2021年1月14日《人民日报》)

#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统一战略基点与战略方向

刘 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这一新发展格局应坚持怎样的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或者说战略支撑在于创新，创新驱动和引领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动能。

## 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新发展格局之所以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首先是适应国内外经济条件变化的客观要求。就国际经济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低迷，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020年全球进入严重经济衰退，预计会出现4%—5%的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面对的全世界经济市场需求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条件难以持续，以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拉动经济规模高速扩张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这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演变，使得我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初级产品，然后利用国内制造生产成本低廉优势加工，向发达国家出口最终工业消费品，再由发达国家进口资本（技术）密集产品，加强国内制造生产能力，形成“世界工厂”的“双环流”格局必须改变，调整为以扩大内需为立足点。

其次，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我国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一方面，大国经济的发展正常条件下应大都属于“基本内向型”，即投入和产出的绝大部分（比如各80%以上）依靠本国市场实现周转及循环。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净出口

占我国GDP比重近10%。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发展尽管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具体内涵和实现条件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需要重塑新竞争优势，回归大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常态。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规模都已发生显著变化，GDP总量预计突破100万亿元（2020年），占世界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至2020年的17%以上。GDP年增长量近年来占全球GDP年增加值30%以上。尽管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成长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仍处于持续强劲扩张期。这些条件使得我们能够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

##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

新发展格局之所以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国民经济循环或生产及再生产可以从供给或需求两个方面进行核算及调控，从哪个方面入手则需视经济运行失衡的主要矛盾变化而定。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矛盾长期集中于需求端，或需求膨胀（1978—1998），或需求疲软（1998—2010）。因此宏观调控集中体现为以需求管理为主，或长期紧缩需求以遏制通货膨胀，或扩大内需以缓解经济下行。进入新常态以来，潜在的成本推动的通胀和需求疲软形成的“下行”并存，需求管理面临严重局限，既不能全面紧缩需求（不利于遏制“下行”），也不能全面扩张（不利于遏制“通胀”），只能把调

控重点由需求端转移到供给侧，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为提升经济抗危机能力，各国普遍的共识是加强供给侧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壮大实体经济，创新驱动，重新改造制造业，升级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成为重中之重。

其次，供给侧与需求端入手的改革和政策之不同，重点在于需求端直接涉及消费者，供给侧则直接影响生产者，包括微观意义上的企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产业（企业与企业的集合）、宏观意义上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产业与产业的结构），因而直接涉及“效率”。而我国现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就在于提升“效率”，从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切中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发展上看，这里的“不平衡”主要是指供给侧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不充分”突出的是指供给侧发展的质量水平不足。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为战略方向适应主要矛盾运动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使得我们在政府与市场、宏观与微观的相互关系上具有更显著的优势，协调好“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的有机统一，从而既能深化供给侧改革，从企业、产业、国民经济体系等不同层次深入克服一系列结构性失衡，同时又能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克服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供给革命”与市场自由竞争之间的制度悖论。

## 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统一 实质在于供求间的适配性和协调性

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统一要

求提高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而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即是指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包括总量上的均衡和结构上的协调。而这种宏观上的均衡状态和结构上的协调，在微观上是以资源配置充分有效为基础的，即企业获得最大收益而市场组织和结构又处于最优状态。正因为如此，发现“均衡”位置和实现“均衡”目标才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阐释与追求的基本问题。尽管“均衡”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但并未因此使人们放弃推动经济趋向均衡的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统一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就是出于适应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主题的要求，提升供求适配性，推动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周转和循环更加趋向于均衡。

一方面，要以有效需求牵引并刺激供给，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的增长和结构性改革首先必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动，满足市场需要，有效需求的扩张是供给增加的前提，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供给结构演变的导向，不能脱离市场需求盲目扩大供给。另一方面，要以优质供给满足需求并创造需求。提高供给质量、完善供给结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发展途径，尤其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上看，仍远未超越供给可以创造需求的发展阶段。统一战略基点和战略方向，就是要实现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优质供给创造需求，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动态均衡，推动实现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主题。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1期）

# 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 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

马建堂

面对正在加速演变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时期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开好局、起好步，就必须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正确认识国际形势、牢牢把握世界大局演变走势，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抓住机遇，趋利避害。

## “十四五”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影响世界变局和大国兴衰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不断深入和加速。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集群式创新浪潮风起云涌，正极大改变着世界面貌。基础科研方面，基础研究屡获新突破，不断拓宽人类对宇宙演化、物质结构、生命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的认知。技术创新方面，创新突破明显提速，量子领域、人工智能、3D打印、基因编辑等方面的颠覆性技术持续涌现。产业变革方面，成熟技术加速落地，产业转型升级日新月异，5G商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加快推动社会智能化发展，区块链技术向多领域拓展，商业化航天产业迅速发展，生物医药突破不断，大健康产业茁壮成长。

这些巨大变革将催生无数的新产业、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谁在某一领域率先取得科技突破，谁就会占据这一领域的首导和头部地位，成为这一领域产业分工的中心，进而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和全球竞争格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使各类生产要素相对地位发生明显变化。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推进，特别是知识、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崛起，传统生产要素和新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将发生明显变化。生产过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将使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地位相对下降，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正在成为国家竞争力中更加重要的因素。产业结构高端化的内涵将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三次产业比例关系越来越难以衡量产业高端化水平。产业结构现代化将更多体现为信息数据要素投入而导致的边际效率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据规模、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加工能力、数据治理体系，将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边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对全球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以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对简单脑力劳动和程序化工作的替代将进一步加快，数据、知识相较于土地、财富而言，其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智能机器人和人之间或将形成替代与互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将更容易导致中产阶级扩张放慢，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态势加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带来机遇与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打开了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地带的机会窗口，使我国能在部分领域加快实现从“跟跑”到“并跑”进而“领跑”的跨越。“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进一步显现，要素聚集能力大

幅提升，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孵化、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支撑。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能力和制度优势等方面的有利条件，也将为我国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大战略机遇开辟更广阔空间。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有的西方国家为保持竞争优势、控制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可能不惜成本和代价对我国进行围堵和打压。我们要化危为机，就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要求，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 “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将重塑全球分工格局和治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将深刻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在科技革命和自由贸易推动下，全球各个国家或经济体从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出发，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分工与重塑，以实现全球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然而“十四五”时期，受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特别是全球疫病大流行带来的各国对产业链安全性的高度关注，经济全球化可能会遭遇一些波折或调整，导致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同时，服务贸易地位将进一步上升，数字产品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占比也会明显提高。跨境投资规则可能更加复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布局将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并重。

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将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和分工格局发生明显变化。除美国、欧盟、日本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持续崛起，部分新兴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美国在继续从事研发和高端制造的同时，将成为重要的能源生产供给地；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加快中低端制造的升级，并成为研发和高端制造的重要参与者；中东、拉美等能源资源生产国将加快工业化和产业多元化进程，全球分工格局将面临系统性调整。

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为我国带来机遇与挑战。当前，全球经贸规则正处在重构期，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我国逐步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向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话语权不断增强。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响应。

与此同时，国际上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有的西方国家可能借WTO的改革，企图在产业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网络安全、市场开放等领域提出一系列不合理要求，逼迫我国放弃更多发展中国家差别待遇。受一致同意原则的制约，WTO在电子商务、竞争中立、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方面的谈判进展迟缓。《美欧自由贸易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正在推进，可能会推出一系列新的贸易规则。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我们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公平合理、合作共赢，不断深化对外合作，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在推动和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摘自《党建》2020年第12期）

· 相关阅读 ·

# 北京：“十四五”时期完成六大发展目标与十二项任务

## “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与任务

主要目标：

- 首都功能明显提升。
- 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明显提升。
- 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 生态文明明显提升。
- 民生福祉明显提升。
- 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主要任务：

一是全力做好政治中心服务保障；二是扎实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三是持续强化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四是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五是纵深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六是构建特色与活力兼备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七是建设高品质宜居城市；八是大力推动绿色北京建设；九是携手共建健康北京；十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十一是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十二是塑造更加安全的城市。

## 2021年重点任务

2021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

境质量进一步改善。

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强化创新核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 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
-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 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
- 深入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切实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 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
- 持续改善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更好共享发展成果。
- 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首都和谐稳定。
- 持之以恒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摘自2021年2月1日《北京日报》，原题为《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1月23日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 相关阅读 ·

# 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基本实现

## “十四五”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主要目标：

- “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基本实现。
- “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 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 城市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 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重点任务：

一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抓住“牛鼻子”形成发展合力。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全力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推进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加快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

二是坚持创新引领，协同打造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着力培育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培育创新生态，优化创新空间布局。

三是加快构筑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增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

四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现代都市型农业升级版，推动农村全面发展进步，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五是全力打造改革开放先行区，构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

活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自贸试验区“首创性”制度创新。

六是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美丽天津。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

七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提高就业质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天津，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八是推进社会高效能治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筑牢首都“政治护城河”，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 2021年重点工作

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一般公共预算增长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新增就业35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以内，节能减排降碳指标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为实现上述目标，着力抓好以下重点工作：

- 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
-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 着力实施高效能治理。
- 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 努力提高群众生活品质。

（摘自2021年2月1日《天津日报》，原题为《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1月25日在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 相关阅读 ·

# 上海：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到2035年，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功能全面升级，基本建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人民城市，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引领城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窗口和城市标杆。到2025年，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取得显著成果，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重大进展，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迈上新台阶，人民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城市核心功能更加强大，人民群众生活更有品质，城市精神品格更加彰显，生态环境质量更为优良，超大城市治理更加高效，谱写出新时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篇章。

围绕目标，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突出了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全力优化战略布局，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二，全力强化“四大功能”，持续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和能级。第三，全力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第四，全力建设人民城市，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2021年主要任务

2021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是：全市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1%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以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5%左右，环保投入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3%左右，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进一步下降。

要重点做好以下九方面工作：

——聚焦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聚焦强化“四大功能”，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聚焦发挥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引领作用，推进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

——聚焦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加快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聚焦常态化疫情防控，坚决守牢城市安全底线。

——聚焦民心工程和民生实事，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聚焦“三园”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聚焦文化供给提质增效，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

——聚焦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上海。

（摘自2021年1月29日《解放日报》，原题为《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1月24日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 相关阅读 ·

# 重庆：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 “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主要目标是：以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发挥示范作用。

展望2035年，重庆市将与全国一道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收入较2020年翻一番以上，重庆“三个作用”发挥更加突出，进入现代化国际都市行列；成渝地区建成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双城经济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十四五”时期，重点推进十一个方面的工作：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深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释放“一区两群”空间布局优化效应。

——壮大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统筹乡村振兴和城市提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在更高起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建设。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统筹发展与安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 2021年工作安排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进出口总值增长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2%以内，粮食产量稳定在108亿公斤，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左右。

重点抓好十个方面的工作：

——更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加快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持续实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

——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摘自2021年1月28日《重庆日报》，原题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1月21日在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 2021：中国经济从结构性复苏 向全面复苏转换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展望2021年，中国经济由结构性复苏向全面复苏转换，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逐步增强。然而，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2021年需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努力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 2021年经济运行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 1. 经济环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一是全球疫情仍存在不确定性。当前，全球疫情蔓延扩散态势尚未获得有效遏制，境外新增确诊病例屡创新高。

二是中美竞合博弈更趋激烈。美国源于长期战略遏制、短期转移国内矛盾等因素，不断动用国家力量并联合相关国家，使用出口管制、提高关税等措施加大对我国的打压力度，“实体清单”范围持续扩容，且制裁方式和手段更趋多样，未来随着美国境内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步好转，对我国的遏制打压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

三是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有所暴露。首先是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尤其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整体偏高，2020年三季度全社会总杠杆率已升至270.1%，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达164.0%，相较2019年末分别上涨了24.7个和12.7个百分点。其次是债券违约风险有所加大。2020年10月份以来，永煤、华晨、紫光等大型国企债券出现超预期集中违约，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大量企业债券的发行被推迟或取消。

再次是信用债到期规模较大。2018年以来，信用债发行短期化趋势十分明显，且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趋势。最后是企业应收账款增加。2020年企业利润状况有所改善，但经济循环依然不畅，企业应收账款快速增加，2020年前11个月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6.5%，较2019年同期大幅提高11.9个百分点，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也出现不同程度延长。

### 2. 增长的有利条件

一是新冠肺炎疫苗大规模上市接种有望加速经济秩序常态化恢复。近期，全球多款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问世并加快接种，主要经济体已陆续接种疫苗或已公布相关接种计划，中国、美国、欧洲等研制开发的疫苗在2021年一季度预计可实现大规模接种，并有望在2021年实现全球大面积普及，这很可能使疫情在2021年内较快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步减弱。

二是全球宏观政策整体继续友好。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均采取了各种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和纾困措施等，全球主要央行在2020年共降息200多次，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持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宽松政策的刺激效应仍将持续显现。随着近期第二波疫情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再起，各国经济体进一步加大纾困方案的力度。

三是外部经济整体上边际回暖。随着全球各国复工复产稳步推进，全球供应链正加快修复，世界经济有望迎来“填坑式”复苏。同时，我国与亚太地区合作将巩固深入，RCEP于2020年11月签署，世界最大自贸区诞生，这将促使我国与亚

太地区的经贸加快恢复，拓展我国的外部经贸空间。2020年12月30日，历经7年、35轮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这将极大改善我国对外投资格局，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增添动能，也将缓解欧洲经济、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 2021年全年经济增长形势预判

展望2021年，经济动能有望获得持续修复，经济总体复苏态势仍将持续。

一是服务业修复进度有望提速。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步好转和新冠肺炎疫苗的陆续上市，原本景气度较低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务业增长将逐步回升。二是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仍具后劲。2021年广义财政空间大概率出现收缩，可比部分的基建投资增速将低于2020年，但在宏观杠杆率和货币供应量基本稳定的背景下，仍将保持一定韧性。预计2021年房地产市场仍将保持一定景气度。三是制造业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2020年11月，制造业投资增速已升至两位数水平，2021年在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终端需求稳步修复、产能回补以及低基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预计制造业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同时，需求持续修复也受多重因素制约。源于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需要，部分接触性、聚集性消费潜能难以有效释放，住宿餐饮、文体娱乐等领域消费仍远低于往年正常水平。同时，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3.9%，大幅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在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住户存款大幅增长，显示居民消费倾向显著下降，且伴随着疫情冲击下就业市场压力保持高位，未来居民收入状况及消费的改善仍面临较大挑战。

综合判断，2021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8%左右。同时，在2020年较高基数和2021年低翘尾因素的双重影响下，预计价格形势将保持总体稳定。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上述8%的较高增速是

在2020年极低基数的基础上得到的，同时已假设2021年疫情不出现大面积反弹、全球经济实现渐进复苏，但若全球和国内疫情出现反复，经济增长数据将面临较大波动。

## 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 1.继续做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是典型的外生冲击变量，只有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加紧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制、开发和应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疫情对于我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不利影响，推动我国经济重回正常运行轨道，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能和活力。

### 2.财政政策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持续强化财政资金对“六稳”“六保”任务的支撑作用，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压一般、保重点，优化财政资金配置，坚持量入为出，大力压减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开支。逐步清理规范过高承诺、过度保障支出政策，建立完善新增民生政策事前论证评估机制。做好财政预算，使收入预算目标与疫情防控、减税降费和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高质量完成减税降费任务，精细规范税收管理，推动税收优惠政策快速顺利落实到位，巩固和拓展其他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成效，控制非税收入增长，避免发生“跷跷板”效应，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活力。

### 3.做好后疫情时期的金融支持

一是用好各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提升结构性政策力度和效果，继续落实好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政策，在实体经济恢复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进行精准扶持。

聚焦重点领域，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农牧业、文化旅游业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通过银团贷款、系统内联合贷款、总行直贷等方式，保障重点项目、重大工程顺利实施。管好用好中央特殊转移支付、抗疫特别国债等新增资金，强化资金直达机制和监控机制。

二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加强金融项目延链、补链工作，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积极推进景区收费权质押、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等新型融资方式，扩大知识产权抵押贷款规模。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以其试点为抓手，鼓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争取绿色贷款。

#### 4.积极有效促进消费投资增长

一是促进消费进一步恢复。强化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进一步挖掘乡村消费的潜力。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二是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加强重点项目资金保障，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地进度。积极推动能源投资稳定增长，特别是扩大新能源投资，推进能源实现绿色发展。扩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未来实体经济增长潜力。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一步扩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5.加大民生领域工作力度

一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推行“防贫保”业务和建立“救助基金”。

二是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加快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招聘等政府统筹计划实施，加大基层社区服务、公共卫生和就业扶贫等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新建一批创业孵化基地，积极发展基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的新就业形态，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

工作。全面落实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补助在岗转岗培训，推进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提升零工市场综合服务功能和综合服务水平。

三是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稳定居民收入预期，研究制定城乡居民收入合理增长的实施意见。落实各项增收政策，健全全社会各类从业人员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加大工资清欠力度，完善保障工资增长的第三方机制。

四是跟踪监测与民生密切相关领域商品市场的价格变化情况，及时防控市场投机异常波动。

#### 6.防范化解重大领域风险

一是坚持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围绕关键节点预防重大突发事件，做好应对更为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根据形势需要适时适度灵活调整各项应对预案。

二是平衡好化债与增长的关系。要继续稳妥化解政府隐性债务，更加巧妙地处理好财政资金化债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继续扩大与金融机构合作化债成效，降低债务成本。进一步完善资产处置管理机制，拓展化债资金来源。加快推进融资平台转型，增强企业自身的融资能力。

三是关注社保基金缺口风险，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四是有效防控金融领域风险。密切跟踪监测杠杆率较高、盈利能力较弱行业国有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以及债券违约风险，建立及时干预和沟通机制，积极与市场投资者沟通，防止资金链断裂引发连锁反应。做好中小银行专项债补充地方法人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方案，通过引入新股东参与银行管理，在资本注入过程中改善公司治理、提升银行价值。全力压降不良贷款，推动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向上级行争取核销政策，加大与各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对接力度。

(摘自2021年1月11日《中国经济时报》)

# 2021年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

刘 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2021年经济工作要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来展开。我们要积极发挥财政职能的作用，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2021年要扎实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第一，精准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进一步完善并抓好直达机制落实。按照“扩大范围、完善机制、严格监管、强化支撑”的原则，在保持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扩大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对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纳入直达范围，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同时，提高直达资金管理水平，完善监控系统，增强直达机制政策效果。持续推进减税降费。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和实施助企纾困政策需要，要保持一定的减税降费力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各地要加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坚决防止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要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适当放宽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扩大使用范围，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领域项目，优先支持在建工程后续融资。各地要提前做好项目前期准备、评估遴选等各项工作，加快项目申报审批，避免“钱等项目”。

**第二，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积极拓展投资空间。用好中央

基建投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优化投资结构，重点用于补齐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推进“两新一重”等重大工程建设。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推动PPP规范有序发展。促进扩大居民消费。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补齐农村流通短板，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渠道。优化进口关税结构，增加优质产品进口。落实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加快出台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财税支持政策，研究制定“十四五”时期支持西藏、新疆社会发展财税政策体系。推动财政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东北振兴等相关政策措施更好发挥实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住房租赁市场发展，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用好中央财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健全成本分担机制，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第三，推动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支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坚持把科技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持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加大对高水平创新人才及团队、科研机构稳定支持力度。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

的体制机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统筹相关资金，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支持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扩大政府采购支持首台（套）推广应用试点产品和地区范围。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切实缓解小微企业等融资难融资贵。

**第四，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失业保险基金等，加大对重点群体就业的帮扶，推动稳住就业基本盘。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进一步改善中西部贫困地区办学条件，支持高职院校扩招，分类推进“双一流”建设。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比例，推进全国统筹。支持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继续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工作。完善社保基金管理。深化投资运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持续做大做强战略储备基金，加强划转中央企业国有股权管理，提升地方委托养老基金管理效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支持发展文化事业产业。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提高文化惠民工程的覆盖面和实效性。完善相关资金基金管理机制，支持推出更多精品力作。

在制定和落实民生政策过程中，各地要进一步增强民生政策措施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使民生支出建立在更有效、更可持续的基础上。一是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对拟出台的民生政策和项目，全面分析对财政支出的短期和长远影响，对评估认定财政难以承受的，一律不得实施。二是推动建立民生支出清单管理制度，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本地区出台的各领域民生政策进行梳理，逐步建立本地区民生支出清单，明确相关政策名称、保障范围、支出标准、备案流程

等，按程序报上级政府备案，提高民生支出管理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第五，完善财政支农政策，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支持耕地质量保护和地力提升，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农田水利建设，推进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继续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支持农业良种培育和种业发展。优化粮食储备结构，增强国家粮食调控能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加大先进、高端、智能化农机补贴力度。积极培育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入推进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大灾保险试点范围。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财政支持政策和资金规模总体稳定，重点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重、乡村振兴底子差的地区倾斜，加强资金资产管理。扎实推进定点帮扶工作。

**第六，坚持资金投入同污染防治攻坚任务相匹配，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加强污染防治。巩固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成果。支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推动长江、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强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源头防控。探索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推进重点生态保护修复。引导重点生态功能区把发展重点放到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上。推动建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整体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实施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环境修复治理。积极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重点行业结构调整，支持优化能源结构，增加可再生、清洁能源供给。继续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等重大工程，强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保护修复和治理，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升生态系

统碳汇能力。研究碳减排相关税收问题。

**第七，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确保财政经济稳健运行、可持续。**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这项工作必须持之以恒、一以贯之、不留后患。坚决防范基层“三保”风险。各地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将“三保”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坚决杜绝出现拖欠教师工资等问题，确保“三保”不出风险。要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地位，将“三保”作为2021年预算安排的重点足额编列、不留缺口。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市县预算的审核，督促市县打足“三保”预算。加强执行监测，结合直达资金管理，动态掌握基层执行情况，严禁挤占挪用“三保”支出，对“三保”保障不到位的地区，要督促地方及时调整预算予以补足，采取加大转移支付、提高资金留用比例等措施予以必要支持。

**第八，坚持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完善税收制度。健全地方税体系，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改革并下划地方。通过税收立法授权，适当扩大省级税收管理权限。研究适时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推进增值税、消费税等税收立法。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等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积极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制定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大力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建设，强化标准应用和调整机制。加快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加强和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扎实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相关工作。健全全国有金融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改革。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资产管理。不断完善国资报告机制和成果运用。

**第九，健全制度机制，进一步强化财政管理和监督。**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严格执行预算法

及其实施条例，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安排支出。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加强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严禁超预算、无预算支出。进一步加强地方财政暂付款管理。加快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各地要尽快完成系统建设，与财政部全国预算管理汇总系统对接。中央一体化系统建设要抓紧研究推进。完善财会监督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以政府部门财会监督为主导的体系框架，加大财会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调。推动会计准则高质量实施，进一步加强会计审计监管。更好发挥监管局作用。各地监管局要在联席会议机制领导下，聚焦财政中心工作，推动重大财税政策在地方落实见效，强化部门预算和转移支付监管，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第十，深化对外财经务实合作，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统筹用好G20、APEC等多边合作交流平台，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强化对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新机构战略引领，深化与世行、亚行等传统机构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定关税减让实施方案，加快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工作。加快中日韩自贸谈判进程，研究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一步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研究出台有利于自贸试验区实现自身功能定位的政策措施。综合采用贴息、专项补助等政策工具，支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更好服务改革发展工作大局。推动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有效运作。积极参与经济数字化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继续牵头做好参与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工作。

（作者为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

【摘自2021年1月7日《中国财经报》，原题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 进一步发挥消费在扩内需中的基础性作用

钱克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促进消费五大路径

促进消费要打好组合拳，就是要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合理消费”。

**一是促进就业增收，让居民能消费。**要创造就业机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序发展城市灵活就业；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支持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支持返乡创业。同时还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特别是以高校毕业生、熟练技工和服务员、新型职业农民等作为重点，培育中等收入“后备军”。完善收入分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优化个人所得税的阶梯税率，逐渐缩小工农、城乡、脑力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此外，要拓宽增收的渠道，特别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稳定资本市场预期；深化农村土地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村居民经营性、财产性收入。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让居民敢消费。**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要发挥社保体系的兜底作用，统筹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医疗保险，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脱贫攻坚的补短板作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大对相对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增加对新

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

**三是加强供需匹配，让居民愿消费。**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品牌建设等为抓手，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提高商品供给与需求体系的适配度，加快发展文旅休闲、体育健康、育幼养老和生活服务业，提升服务供给。完善商贸流通网络，补齐流通设施短板，发展城乡共同配送，引导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下沉，提高物流智能化水平，打通流通主渠道，畅通消费微循环。健全供需循环机制，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推动流通与产业深度融合，搭建一批促进供需对接的商贸流通平台，建设世界一流的综合展、专业性的展会，引领消费升级。

**四是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强化市场秩序的监管，加强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强化线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互联互通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健全联合奖惩机制，全面实施全过程信用监管，逐步建立消费信用体系，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加强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公益和集体诉讼机制以及小额诉讼机制，加大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曝光力度。

**五是倡导绿色健康消费理念，引导居民合理消费。**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指示精神，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要建立激励机制，为绿色低碳消费建立更具明确导



向的价格、标准和政策体系。倡导循环消费，加快二手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要倡导绿色包装，引导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 抓好促消费七大工作

进一步扩大消费，商务部门将重点抓好七方面的工作。

**一是扩大商品消费。**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鼓励开展汽车下乡，促进汽车平行进口健康发展，扩大二手车出口，畅通新车、二手车流通循环。促进家电家具消费，组织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家电家具以旧换新，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促进家电家具的更新消费。扩大进口商品的消费，充分发挥进口博览会的作用，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扩大优质商品进口，促进内外贸的贯通。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引导外贸企业对接国内需求，研发适销对路商品，拓宽出口产品转内销渠道。

**二是提振服务消费。**促进餐饮业恢复发展，创新线上线下经营模式，完善促进餐饮节约和绿色发展的标准体系。促进生活服务业的提质和扩容，进一步完善提升商贸生活服务业的品质。发展社区生活服务，开展社区生活服务业发展的试点，新建和改造一批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三是促进城市消费。**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动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区域消费中心。高质量推进行街改造提升，着力打造智慧街区和智慧商圈。同时还要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开展便利店品牌化连锁化三年行动，支持品牌连锁便利店的发展。推进标准化菜市场建设，改造和提升农贸市场。

**四是发展农村消费。**要提升电商进农村的水平，电商进农村对扶贫有推动作用。下一步还将加快电商发展步伐，扩大覆盖面，健全县乡村

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推进乡村商贸设施建设，建设一批生活消费服务综合体，引导骨干流通企业向农村下沉供应链，推动农村流通设施和业态融入现代流通体系。农产品的流通体系既涉及到农村，也涉及到城市消费，要补齐农产品冷链短板，构建农产品现代供应链，提升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

**五是提升传统消费。**实施传统商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实体商业企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开展商品市场优化升级，改造提升一批农产品批发市场，打造一批衔接产供销、贯通内外贸、线上线下融合的工业品批发市场。加强中华老字号的保护和发展，构建老字号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支持老字号做精、做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六是培育新型消费。**推进线上线下消费的融合，引导实体商业企业积极上线，打造一批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示范企业。发展无接触交易平台，鼓励流通企业、线上平台发展无接触交易服务，支持在社区设立收发站等无接触的交易设施。要促进品质消费，以质量品牌为重点，优化供给结构，扩大绿色健康食品、智能家电、智能家居的消费。促进绿色消费，建设绿色商场，推广绿色包装，发展绿色回收，扩大绿色产品的采购和销售。

**七是优化消费环境。**要推进商务信用体系建设，弘扬社会主义商业诚信文化、强化商务领域的监督管理，加快推进商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加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面实现“清单式”管理，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为新型消费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作者为商务部副部长）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21年第3期）

# 放眼全球：世界经济有望迎来复苏曙光

张宇燕

回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对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投资活动造成严重打击，而世界受冲击的程度又带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疫情演化中蕴含的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的韧性、政策走势及其溢出效应，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以及大国竞合发展态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2021年世界经济的基本面。

## 全球经济表现

总的来看，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速陡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2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4%。新冠肺炎疫情对各经济体造成的冲击并不均匀，发达经济体整体经济萎缩5.8%，其中美国下降4.3%，欧元区降幅为8.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为-3.3%。目前亚太地区已开始复苏，但各国复苏速度存在差异，但从2020年二季度后期开始，中国先行强劲复苏，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经济萎缩通常伴随着物价下跌和失业增加。2020年1月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为2.5%，之后在波动中同比降至5月的0.1%，11月又升至1.2%。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类似，显示出CPI与增长率高度同步，但降幅更大。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物价水平亦走出了相同的轨迹。相较于物价水平的波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波动幅度更大。各国不同产业和群体受到的冲击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低收入者、年轻人和妇女受到冲击最大，贫困人口处境进一步恶化。

贸易与跨境投资的减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异动，亦是经济萎缩的伴生结果。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年9月发布的《2020贸易和发展报告》，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较上年下降五分之一，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缩减40%。在利用外资方面中国是少有的例外。除了受疫情冲击外，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贸易与投资造成持续负面影响。

此外，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巨幅涨落、美元走跌和各国债务迅速扩张，共同构成了2020年国际金融的奇特画面。

## 各国政策分析

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均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临时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从临时性财政政策看，以美国为例，2020年3月国会就通过了总额约2.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纾困与经济安全法案》。随着第二波疫情开始在北美和欧洲等地肆虐，各经济体进一步加大纾困力度在所难免。尽管存在着各种对政策推出时机、规模、执行力度和长期影响等方面的批评，但整体而言，各经济体采取的财政救助政策在维持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转上发挥了直接且显著的作用。

在货币政策方面，2020年前11个月，世界各经济体央行共降息200多次，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要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常规货币政策实施空间极为狭窄，在应对疫情冲击期间主要靠的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量化宽松、负利率与零利率、大银行定向放款和所谓“直升机

撒钱”等。但各种非常规政策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增添了不确定性。从全球来看，尽管实体经济复苏和宽松货币政策将对资产价格形成一定支持，但风险资产价格同经济前景和信贷质量恶化相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经济萎缩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并行，意味着全球资本市场在未来出现巨幅波动不是小概率事件。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势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并由此激起负向反馈。

2020年全球经济中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元汇率的“异常”变动。以往出现衰退或金融危机时，人们通常会本能地通过增持安全资产以求自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元资产均扮演了全球安全资产的角色。然而本次疫情冲击引发的全球衰退却在世人面前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2020年3月至9月，外国央行持有美债总额净减约1552亿美元，国债购买者是美联储而非国际投资者和美国基金，以至美国债券价格2020年3月出现了暴跌后一直低迷，并伴随着美元指数的显著下滑。出现这种“异常”的原因除了与美国无限量地向经济注入空前规模的流动性有关外，也与美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式微有关。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在持续上升，同时美国的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下降。这种态势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一方面美元与黄金之间保持固定比率并自由兑换，另一方面美国境外流通着海量美元。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或许就是未来美元走势的一个隐喻。

不容忽视的是，疫情对世界经济实体层面产生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主要在全球供应链上。对企业而言，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紧张和多边贸易体系几近瘫痪、气候与自然灾害多发、网络攻击频繁等，在不同维度加大了出现供应链断裂的可能性。由于技术进步与扩散，特别是生产数字

化已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劳动力成本套利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随着网上购物的普及，消费者对快速配送需求上升，能否快速送达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冲击更是让企业意识到彻底重新评估价值链、缩短供应链、投资更有弹性的供应链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从国家层面看，一些国家陆续出台了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这些都将影响新的全球供应链布局。

## 展望今年经济走势

展望2021年，人类能否控制住第二波疫情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表现，并且极大地增添了预测的难度。

正面消息是美国、欧洲和中国等研制开发的疫苗在一季度应该可以实现大规模接种。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都将延续财政纾困政策和与之密切捆绑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并且已经为此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负面消息是2020年12月英国出现新的变异病毒而且传染性更强以至于伦敦开始封城。欧洲央行据此已经下调了2021年欧元区GDP增速预测值。大概率是2021年世界经济会在坎坷中实现复苏，同时复苏会因地域不同而快慢、先后各异，主要发达经济体一季度有可能重现收缩并在二、三季度加快复苏步伐，全球复苏将从V型转换成不规则的W型。严重受疫情左右的复苏态势，势必导致就业、物价、贸易、资本与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等发生相应变化。

即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2021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将面临各种非疫情扰动的影响。标普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尽管与2009年相比全球银行业整体状况更加健康，但该机构目前仍对全球三分之一的银行持“负面”展望，2021年全球银行业可能面临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为艰难的年份。短期和中期全球银行业面临以下风险：一是在疫情

受到全面控制之前持续受到压力的银行其信用评级可能会下降；二是各国政府将陆续结束对受疫情影响部门的援助，这些短期援助可能增加企业和家庭负债从而使它们难以在正常时期融资；三是企业债务的持续增长和更多的违约，将使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承受巨大压力；四是房地产市场潜在问题增多且严重性被低估，因疫情而加剧的网络销售和远程办公等亦会给业主带来财务问题；等等。

除了微观层面的风险外，全球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蕴含的风险亦不容低估。更让人忧虑的还是美元汇率走势。虽说影响其涨跌的变量甚多，

但未来几年美国延续已有货币政策似无悬念，美元走跌的可能性应该更大些。与此同时，个别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因违约引发连锁式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放眼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可以预见的是，围绕WTO改革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将同比例强化，取得突破和陷入僵局均有可能。如果《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得以签订，再加上RCEP的落实，至少在贸易投资领域，世界经济复苏的曙光将更加明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2021年1月4日《经济日报》）

· 相关阅读 ·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 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

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

三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四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

五是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

六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

七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八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摘自2020年12月18日“中国新闻网”）

# 互联网新经济良性发展需实施有效监管

王思寒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新经济和旧常态正处于转换阶段，在传统经济基础上，互联网新经济为我国提供了新的产业驱动，其创新概念、未来预期以及相关设施的搭建都将创造出新一轮的繁荣机遇。近年来全球实体行业持续低迷，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税收大幅度锐减，将使用债务融资的方式，将资金注入经济体当中，通过投资相关产业建设来扶持新经济的发展，维持就业、增加购买力、帮助经济进一步复苏。

## 发展现状

**1.文化。**文化产业通过新兴起的数字经济中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方式，向大众进行传播。2020年春节期期间，由于受疫情影响，部分电影也从院线撤档，放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直播放送，给平台和观众都带来福利。

**2.教育。**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有隔离需求，学校都使用在线教育的方式进行授课和听课。很多学生都以录制视频的方式交作业，从而减少了通勤的时间成本以及空间成本。

**3.医疗。**线上医疗可以帮助消费者节省时间，增加医疗资源的可得性，同时还可以帮助医院分流，缓解部分医院的拥堵状况。由于我国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教育和医疗资源也相对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线上医疗还可以照顾到更多受地域限制的农村以及城镇居民获取相关的医疗资源。

## 存在问题

**1.运维成本。**前期的建设、开发以及后期运维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与劳动力共同完成，之后则需要有足够的用户和商家在平台上进行参与，来实现线上和线下的活动，维系互联网新经济的发展 and 顺利进行。并且所有的互联网经营模式几乎都可以被轻松复制和传播，导致进入门槛降低。因此，只有在平台法律和技术稳定的状态下，同时具备足够多的商家、用户和消费者参与，才能够让商家、平台和消费者从中获取方便和利益。

**2.内容安全。**以直播行业为例，在各个平台上：视频造假、带货“三无”产品等行业事故屡见不鲜。这些内容除了造成社会矛盾之外，还可能对个人声誉、公司股价以及某个产品和行业造成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内容多、传播广，知识产权问题也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对于以后的创新和研发造成障碍。

**3.业务监管。**由于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与许多其他产业进行结合，给监管造成了一定困难。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形式多样，导致监管政策滞后，监管框架和防风险手段落后于创新的速度；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与其他产业进行融合的过程中，界限模糊也给监管造成难度。如互联网金融，许多大型科技互联网公司(BigTech)凭借自身的用户数量和业务优势，开展了小额贷、微粒贷、芝麻信用等业务。但监管主体不够明确，对于此类风险识别不够精准，未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合理合适的监管框架，完成监管主体

之间的协调合作。

## 完善建议

1.为互联网经济发展提供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优质、稳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包括个人、单位、机构等主体全民参与到互联网新经济建设以及发展的基础，并且符合《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指导意见，增加5G通讯技术基站个数和千兆宽带的使用规模，增加全国的网络覆盖率、互联网使用人数并增加他们的使用频率，进一步加强计算机、智能手机等通信联网设备的制造与开发，不断降低互联网使用和网络交易的成本。同时，也需要建立线下网点去支持线上交易，如网店的物流网点、电子商务的线下体验店等，及时解决线上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疑惑，帮助进一步优化线上体验，培养用户习惯，开展数字经济。

2.加强互联网信息安全。信息安全涉及消费者、投资者以及机构的隐私安全和财产安全。由于许多业务需要在安全级别较高的环境下进行操作，安全问题除了影响行业广度以外还会影响行业深度。因此，可以通过对上传者 and 平台进行资质审核，以线上、线下或者上门的方式，对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和使用者进行定期培训和科普，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操作规范。对于自己丢弃的旧手机、旧电脑，要将数据及时清空和恢复出厂装置。谨防钓鱼网站、电信诈骗等途径输入个人信息。对于部分信息需要进行加密处理，并且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防火墙的开发和研究。另外，针对信息泄露、贩卖、购买和窃取，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尽快落实和修订《个人信息保护法》保证行业的健康发展。

3.扩张互联网新经济的行业范围并加强其业务规范。在互联网行业与其他行业相融合期间，产生了大量创新业务，但业务界限模糊，监管主体不明确，尚存在一定风险。为了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应加强互联网和更多传统产业的融合与合作，鼓励和促进各个行业开展线上业务，进行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进一步完整线上产业链。在保障创新发展、产融结合的前提下，创新监管理念，避免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在信息安全的基础上，保证平台和行业的透明度，确立互联网业务与其他行业之间融合业务的边界，明确监管主体，培养相关复合型人才以及相关的产融监管主体，对业务进行指导与规范。

4.进行专业人才引进。在互联网新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业界、学界和政界不同岗位和职能的人才来引导互联网新经济的有效发展。同时，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本配合完成相关概念、基础设施建设、正常业务以及法律法规的开发和运维等系列工作。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通讯技术基站、千兆光纤、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制造等多项工作。业务包括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各个行业的创新业务以及维护互联网和业务稳定点的新增产业。产业创新、研发与维护需要更多行业与互联网复合型人才。前期投入后，后期需要媒体运营及互联网线上、线下营销来宣传相关业务，保证其未来顺利开展。在新旧经济交替期间可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维系居民的消费水准，减缓经济疲软的迹象，保障经济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自2021年1月11日《金融时报》)

# 乡村振兴战略的“四重超越”特征

王红艳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科学阐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层理念支撑，仍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而且，这也是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基础工作。政策文本分析发现，相较以往相关政策安排而言，该战略在理念上实现了诸多历史性突破。

## 超越工具主义

乡村振兴战略在理念上的第一个历史性突破，是其在对乡村角色的定位上基本超越了工具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确承认乡村作为人类社会本体之组成部分的地位。二是明确承认乡村作为国家本体之组成部分的地位。三是明确指出实现乡村振兴亦是民生福祉本体的组成部分。

这一认识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在此之前，乡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大致先后扮演了三种工具性角色。其一，“实现原始积累的工具”。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村和农业主要被用作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工具。其二，“化解风险的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乡村和农业一度被看作化解国内外风险的工具。其三，“反哺对象”兼“拱卫城市的工具”。21世纪初期，乡村拥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乡村和农业成为“反哺对象”。另一方面，现实中还存在一些将乡村和农业当作汲取资源之工具的情况。

## 超越城市中心主义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城市

中心主义倾向逐步成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工业化、城镇化战略更是凯歌高进，乡村和农业则似沦为“闲棋冷子”。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语境中，农业贡献明显乏力。其二，在城镇化战略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乡村必定走向终结几成共识。

进入21世纪，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得以提出和践行，乡村和农业再度受到重视。一个积极信号是：2004年，我国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关于促进农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见》。自此，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部署“三农”工作的传统得以恢复和沿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和农业在这一时期还是被认为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框架中的问题，城市中心主义色彩尚未完全褪去。

乡村振兴战略则不同，其在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上基本超越了城市中心主义，同时，在调整城乡关系的路径上尝试超越“城市利益让渡”范式，而这正是该战略的第二个历史性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乡村、农业与城市、工业的地位趋于平等，前者服从和服务于后者的主张逐步式微。该战略意见对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模式所做的界定是：在要素上能实现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在产业上能够实现互促共荣，在功能上能够实现互补融合。另一方面，乡村、农业工作与城市、工业工作的权重趋于平等，前者分量严重轻于后者的局面有望扭转。该战略意见对新型工农城乡工作关系模式所提出的要求是：不但要做到工农、城乡“一起抓”，而且在统筹部署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要工作时要赋予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权”。

## 超越经济主义

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三个历史性突破是：其在发展目标设置上基本超越了经济主义，将“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作为基本工作原则，宣示要“努力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设定“全成员”目标。该战略意见强调要切实维护好全体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促进全体农民的生活富裕作为实施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但要做到发展依靠人民，还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和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是设定“全系统”目标。该战略意见强调要统筹谋划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密切关注六大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和协同性，并加以整体规划和部署。三是设定“全要素”目标。该战略意见强调要按照“二十字方针”的总要求推进乡村振兴，并阐明了各要素的定位和功能，其中，“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本”。四是设定“全维度”目标。该战略意见强调要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并提出“到2050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全面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不但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且提出了“十四五”时期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重点启动综合服务能力提升、村镇规划建设、乡村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整治和农民素质优化“五大重点行动”。从中可以看到，“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原则得到持续践行。

## 超越物质主义

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总体安排中，推动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强调的是贯彻“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物质主义倾向相当明显。

而在乡村振兴战略意见的文本中，一方面，认为实施战略必须解决资金来源和资金保障问题，为此，不但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而且需要不断加强资金投入保障制度和投融资机制创新；另一方面，突出强调要多管齐下，充分发挥非物质、非金钱手段和作用，表现出超越物质主义的努力，而这一点正是该战略的第四个历史性突破，具体表现为：其一，主张“坚持党管农村工作”。该战略意见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切实发挥党在农村工作中总揽全局与协调各方的作用。其二，主张“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该战略意见强调要尊重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用足用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乡村振兴提供量足质优的人才支撑。其三，主张依法推动乡村振兴。一方面，该战略意见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切实增强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等方面的作用，同时，注重总结提炼，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尝试建立专项标准体系。另一方面，战略规划强调，要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法治素养，引导广大群众依法依规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其四，主张发挥道德激励约束机制的作用。该战略规划强调，要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科学构建符合新时期新要求的乡规民约，并藉此引导广大农民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提高，努力营造德法相济的良好局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国家治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摘自《新视野》2021年第1期，原题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四重超越”特征——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求是》杂志评论员

开启新征程，所有工作都要围绕开好局、起好步来展开。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深刻阐述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确保“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2020年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定不移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从政治上看全面从严治党，就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要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

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

从政治上看全面从严治党，就要从政治上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腐败是社会毒瘤，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腐败，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什么。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必须赢得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从政治上看全面从严治党，就要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清醒看到，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这样的现实判断令人警醒！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威胁党和国家政治安全。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是木里矿区非法采煤，还是秦岭北麓违建别墅事件，这些年党中央查处的多起严重违法违纪事件，都是从政治纪律

查起，推动了问题的根本解决。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交织，“四风”成为腐败滋长的温床。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 确保“十四五” 时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确保“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这是新发展阶段全面从严治党的“主攻方向”。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等重大决策，围绕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等重点任务，围绕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等部署要求，加强监督检查，督促落实落地。推进纪检监察工作理念、思路、制度、机制创新，深入实践探索服务保障现代化建设的有效举措，大力推进清廉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

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将正风肃纪反腐与“十四五”时期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用好“四种形态”，综合发挥惩治震慑、惩戒挽救、教育警醒的功效。做好金融反腐和处置金融风险统筹衔接，强化金

融领域监管和内部治理。将防腐措施与改革举措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推进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有针对性地补齐制度短板。

要毫不松懈纠治“四风”，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深入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毫不妥协，全面检视、靶向纠治，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督促全党担当尽责、干事创业。坚决整治政法战线违纪违法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保护伞”，决不让其再祸害百姓。紧盯党中央惠民富民、促进共同富裕政策落实，持续纠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扶贫环保等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2020年1月至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履行脱贫攻坚责任不力的9554名党员领导干部进行问责；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5.69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5万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3.57万人。

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使监督融入“十四五”建设之中。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要跟进到哪里，把监督贯穿于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把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作为实施规划的基础性建设，构建全覆盖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不断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各种监督协调贯通，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充分发挥监督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监督落地，让群众参与到监督中来。纪检监察机关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围绕现代化建设大局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摘自《求是》2021年第3期）

#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张 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是对旗帜鲜明讲政治要求的具体化，对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政治能力提出了新的课题。

**提高政治判断力，就是政治上要清醒，这就要求我们“学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确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这实际上就是强调把准政治方向、坚持政治立场、坚守政治理想，提高总书记一贯倡导的把握方向、把握大局、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驾驭政治局势、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特别强调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

**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政治上要明白，这就要求我们“弄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实际上就是强调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以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提高总书记反复阐述的把握“国之大者”的

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求深入。要把新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贯通起来学，把新思想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联系起来学，真正领悟理论渊源、科学原理、真理品格、思想方法，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从而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

**提高政治执行力，就是政治上要坚定，这就要求我们“做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这实际上就是强调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总书记念兹在兹的狠抓工作落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见成效。要切实以新思想为科学指南，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作风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摘自2021年1月15日《中国信息报》）

# 基层干部在危机治理中要 防止陷入路径依赖

王 培

基层是危机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薄弱环节。全面提升基层干部危机治理能力，既需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担当的选人用人机制、权责对等的体制机制、危机防控的常态化机制，也要增强基层干部防范化解危机的本领，彻底摆脱路径依赖。

## 基层干部在危机治理中陷入路径依赖 的典型表现

**危机决策过于依赖上级授权指挥。**目前自上而下的管控思维和唯上是从的错误观念在危机治理实践中依然存在。有些干部面对危机的诸多不确定性和高危险性，习惯等着看上级如何处置和安排，却忽视已经建立起来的应急制度体系，久而久之，固化为“不推不动”的依赖性思维。

**危机处理习惯于形式主义操作。**面对危机，有些领导干部执行上级决策时难以摆脱层层开会、逐级发文、频繁检查的“固定套路”。一些形式的操作，消耗了基层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仅不能提高工作效率还人为增加了险情，引发群众不满。有些基层干部开展工作依然靠开会发文、报表留痕、台账检查“老三样”，危机管控单纯依靠人海战术，习惯于形式主义操作。

**依靠传统的封闭式管治应对危机。**在以往危机治理实践中，有些基层干部仍习惯将政府看作危机治理的唯一主体，对重大风险的预判、监测和控制单纯依靠政府的封闭式管理，按照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逻辑行事，客观上造成政府要承担无限责任，消耗了政府的公信力。一旦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某些主政者无法将体系内部的

资源与体系外的资源有效协同，不能有效采纳专家、专业人士的建议，协调不好社会各方力量，组织动员群众能力弱化，驾驭不了智能技术，导致决策迟缓、应对被动，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

**依赖于运动式治理化解危机。**运动式治理在化解重大公共危机时有其独特优势，但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容易使基层干部在承担巨大压力时，为在短期内完成某项任务而出现过度管理的问题，处理矛盾不顾实际搞“一刀切”，甚至以权代法，触发新问题的产生。不仅如此，运动式治理成本过高，很多问题表面上解决了，但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一旦运动化治理结束，相关问题还会反弹，依然需要制度化、持续性治理。

## 基层干部在危机治理中陷入路径依赖的根源

**缺少担当不作为。**有少数干部存在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有的在危急关头不敢挺身而出、不愿担责，只等着上面部署；有的在危机时刻不分轻重缓急，作风漂浮、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还有的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危机面前相互推诿、临阵脱逃。这样的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遇到棘手问题绕着走，关键时刻失职、渎职、玩忽职守、尸位素餐，经不起危机考验，危害很大。

**权责的非对称性。**基层干部处在整个科层体系的最末端，权力最小，资源最少，问责压力却很大。由于上下级政府间权力不对称，责任边界不清，一旦出现危害性后果往往强调属地责任，问责基层干部。为了避免被追责，在不确定性、扩散性风险陡增时，基层干部常采取忙而不

动、纳入常规、请示汇报、表面应付等消极应对策略，用形式主义掩盖未落实的工作，以“不干事”达到“不出事”。

**应对危机的本领恐慌。**在公共危机治理实践中，一些干部暴露出本领恐慌的问题。有的干部因缺乏危机意识和信息辨别力，不能从有限的信息中发现各种潜在的风险苗头，错过了危机防范的最佳时机；有的干部因危机管理知识储备不足，在危机决策的紧急时刻缺乏判断力和决策力，不能快速作决断，掌控事态发展；有的干部缺乏实践历练，在危机大考中自乱阵脚，落实政策机械僵化、缺乏灵活性；也有的干部在信息沟通和舆情应对上能力欠缺，办法老套，信息发布迟缓，增加了公众猜忌，降低了政府公信力；还有的基层干部缺乏开放式治理思维，遇到危机不愿也不会协调政府内外资源协同共治，经常陷入单打独斗的境地，治理低效。

**危机防控机制不健全。**在危机治理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已初步建立的应对机制被证明存在缺陷，尤其是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不能有效启动联动机制，甚至造成风险叠加，亟须由一种快速见效的运动式治理机制来替代。但运动式治理始终是一种短期的、集中式的、强制性的治理方式，只能暂时缓解危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还需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危机防控机制。

## 提高基层干部危机治理能力和水平

**健全激励担当的选人用人机制。**一是在危机时刻火速提拔使用一批表现突出的干部，及时调整渎职、失职、玩忽职守、尸位素餐的干部，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能上能下的用人导向。二是完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既要注重平时考核也要在重大危机中识别干部，将“是否作为”视为考评干部的关键条件。三是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示范作用，形成“头雁”效应。

**建立健全权责对等的体制机制。**一是进一步向地方政府放权赋能，赋予基层干部更加平衡的“权、责、利”匹配的制度关系，保证地方干部在危机突发时有一定的决策权，能根据实际情况快速作出判断，采取果断措施有效制止危机蔓延。二是按照权责对等的要求，制定权责清单，厘清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之间的职责边界，防止层层甩锅推卸责任。三是加大向基层干部政策、资源的倾斜。既要向基层干部下放更多的管理权限，还要加大薪酬、福利、晋升等政策的倾斜，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避免问责泛化、不当问责，激励基层干部面对高风险敢于担责、积极作为。四是要切实为基层干部减负，减少基层材料的报送检查，减少形式主义的督查，把基层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释放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增强基层干部治理危机的能力本领。**一是树立危机意识。培养强烈的危机意识是提高危机治理能力的前提。二是定期开展基层干部危机治理能力培训。三是加强干部危机治理的实践锻炼。要多为青年干部提供到基层历练的机会，在大风大浪中锤炼他们动员组织群众和驾驭风险的能力。四是基层干部还要增强创新意识，积极学习新事物、掌握新技术、更新知识储备，跳出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提高智慧治理危机的能力。

**完善危机防控的常态化机制。**一是坚持预防为主，织密织细危机预防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危机防范预警机制，提高危机监测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将危机治理的关口前移，避免一时疏忽酿成大祸。二是打破传统封闭的权力格局，创新共建共治共享的危机治理体系，加强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开放性，健全沟通协作机制，发挥多元主体协调共治的聚合功能，提高危机决策效率，降低危机治理成本。三是坚持依法防范治理危机，不能因危机治理中遇到困难就以权代法、过度执法，损害群众利益。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自2021年1月12日《组织人事报》）

# 稳固与兴旺是边疆治理的历史必然

许建英

中国边疆区域是极具特点的区域，历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近些年来，边疆地区的发展更是广泛受到关注，成为国家规划建设的重要领域。在“十四五”规划中，稳边固边、兴边富边被纳入其中，作为国家未来若干年发展的聚焦点之一。

没有边疆地区的兴旺富裕，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就无从谈起。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边疆的贫困地区必须改变，必须跟上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都不能落下”，这既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

边疆地区是国家的门户，关系着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的稳固与发展还是新时代国家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

消除边疆地区贫困，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边疆地区稳定与安全，深化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都是国家

治理的突出问题。

要实现边疆地区稳固和兴旺的战略目标，就需要对边疆地区的现状做深入调研分析，梳理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and 边防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边疆地区开放力度加大，与全国同步实现脱贫，军民融合发展使国防建设踏上了更坚实的道路。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边疆地区的进一步稳固和兴旺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复杂问题。

一是人口流失导致边疆地区空心化。随着沿海以及内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规划的国家级中心城市主要位于中东部地区，形成了对边疆地区人才、人口的巨大虹吸作用，不少边疆地区人才流失严重，人口流失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影响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区域安全。在这方面，无论是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与西藏地区都存在，甚至有的区域还比较突出。

二是边疆地区文化、教育与科研相对弱化。一方面内地对人才虹吸现象使边疆地区人才流失严重，难以吸引、留住人才成为常态；另一方面边疆地区缺乏重要大学、科研机构的支撑，特别是国家顶级教育和科研机构，与沿海地区比较，边疆



地区文化、教育和科技发展基础弱化，既不利于国家内部软实力的均衡发展，更不利于增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也有悖于国家深度开放的新思维。

**三是产业相对边缘化。**边疆地区长期未能建立较完善的产业链，在新一轮产业升级中也未能占得先机，缺乏创新能力，致使普遍缺少领头羊性质的创新型企业，仍以传统产业、资源型产业为依赖，产业相对边缘化。

**四是新时代边疆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深化。**独特的地缘环境和众多的民族分布，注定加强民族团结和防范境外有害意识形态侵蚀是永恒的主题，新时代要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化，在历史新起点上加强民族团结，真正实现各民族的大交往大交流大交融，扩大共同性，淡化差异性。

**五是边疆地区艰苦落后的认识固化。**长期以来内地对边疆地区存在着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落后的认识，认为边疆地区艰苦、不宜生活的思想固化。

上述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边疆地区，存在于内地对边疆的认识中，这对边疆地区的发展，特别是稳边固边、兴边富边是不利的，必须高度重视，及时加以改变。

如何解决面临的诸多困难，实现稳边固边和兴边富边，是广受关注的重要问题。笔者围绕着聚人、兴业和内外资源整合，谨就陆地边疆建设提出一些宏观思考和建议。

**一是实事求是地制定差异性战略，解决发展路径问题。**中国陆地边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大，安全问题各异，周边环境不同，因此必须实事求是，围绕着稳边固边兴边富边的战略目标，在国家统筹下，制定出各地差异性战略路径，保持定力，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二是建立边疆地区战略支点城市和与之相匹配的城镇化网络体系，解决宜居问题。**国家级战略城市的确定，不能简单依靠现有GDP总额来确定，需要有国家基于历史、国家整合和未来发展

战略之上加以选择和培育。边疆地区战略支点城市及其相适应的城镇化网络体系建设，在均衡国家发展的同时，推动边疆地区现代化，解决宜居问题。

**三是创新开发和壮大与边疆地区资源和内外市场相适应的新产业和产业链，解决宜工问题。**发展创新型的高科技企业为龙头，有效整合边疆内外的资源与市场，形成自己的产业生态链，可有力解决边疆地区宜工问题，奠定人口集聚基础。

**四是制定有效政策实行新时代人口实边战略，解决聚人问题。**边疆地区人口问题是永恒的话题，要建立起边疆与内地人口的双向正常循环。一要做好“聚”的工作，要确保各民族人口比例适当均衡，奠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二要做好“化”的问题，要高度重视边疆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问题，使各族人民的认识确实化于其中。三要提高薪资、改善工作环境，解决“惠”的问题。

**五是建立边疆地区文化教育科研高地，解决聚魂问题。**边疆与内地的均衡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的均衡化，是最好的体现。因此，必须大力发展边疆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聚魂是更为持久的稳边固边、兴边富边的基础。

**六是边疆地区要大力改造国土优化环境，解决“容”“效”问题。**广大边疆地区最大资源是其广袤的土地，当代科学理念和技术的发展，使改变千百年来的蛮荒成为可能，因此要及早规划和改造国土，优化边疆自然环境，扩大有效生存空间。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需要和国家深度开放的历史大势，注定广大边疆地区进入人们的视野，注定成为国家发展和治理的聚焦点，稳边固边、兴边富边政策就是这种历史与现实、国家治理与发展的逻辑的具体体现，彰显出其新时代的重要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2021年1月8日《环球时报》）

# 周代乐政的确立及价值内涵

付林鹏

在古代中国，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实，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了以乐行政、乐与政通的制度体系，也即所谓的乐政体系。

## 乐政概念的提出

“乐政”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一书。在《周礼·春官》中有“乐师”一职，职责包括“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古人关于“乐政”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贾公彦疏言：“‘治其乐政’者，谓治理乐声，使得其正，不淫放也。”以正训政，认为乐政是对乐声的校正。二是孙诒让《周礼正义》言：“政谓若正乐悬、舞位及诸戒令，皆是也。”认为乐政是雅乐演奏过程中的具体安排及命令。两种解释中，贾说较为偏狭，孙说更为融通。《周礼》之外，后代典籍对乐政概念使用较为少见，仅有《续资治通鉴》卷88载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帝锐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复每为帝言：‘方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帝惑其说，而制作营筑之事兴矣。至是京擢其客刘曷为大司乐，付以乐政。”至此，乐政的意涵得以扩大，指国家层面与音乐相关的一切事务。

当代学者开始较为普遍地使用乐政概念，都有对乐政概念的界定和概括。他们认为，乐政是对周代雅乐制度高度政治化的概括，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礼与乐、乐与政、政与教之间的关系。不过，相关著述对乐政概念的使用，更多是偶一性的，尚缺乏全面梳理与系统研究。故在结合古人注疏及今人乐政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

以将乐政进一步定义为：以周代的雅乐体系为基础，通过乐与礼的整合补充，乐教与乐治的相辅相成，并由此形成的一种政治体制、伦理规范和社会生活范式。另外，与学界最为常用的乐教概念相比，乐政的内涵和外延都更为扩大，乐教其实被涵括在乐政的政治设计之内。

## 周代乐政体系的形成

乐政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吕氏春秋·古乐》载：“乐所由来者尚也。”这说明音乐的起源很早。但音乐的起源，并不代表乐政体系就已经确立。

乐政体系真正得以形成，要到西周时期，以周公的“制礼作乐”为标志。可以说，周公的“制礼作乐”，既构建了新的政治制度，又奠定了新的文化价值传统。周公之“作乐”，很大程度上是以殷商的音乐文化作为参考对象的。在周公制礼作乐之前，周人基本上是“修商人典”，并以之作为举行典礼的依据，但在政治局势稳定之后，周公的制礼作乐，更是在对殷鉴的反思中完成的，包括：有感于纣王“断弃先祖之乐”带来的离心离德，周人完善了自己的祭乐系统；借助殷乐官奔周带来的“祭乐器”，周人确立了新的乐官系统和器乐体系；在损益殷商乐制的基础上，周人构建了新的乐制体系；等等。可以说，虽然周人在制度上对殷商的音乐文化有所继承和损益，但在精神品格方面，却彻底扭转了殷商音乐文化的宗教意义，强化了音乐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以“德”为意识形态的治国理念，从而建构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伦理秩序。



## 周代乐政的学理建构

如果说西周的制礼作乐，主要确立了乐政的制度形态。那么，自西周晚期以来，大量乐论话语的出现，则开始对乐政进行理论反思。一批贤明的专业职官和卿大夫群体，有感于“礼崩乐坏”所带来的剧烈冲击，发表了大量的乐论话语，开始从学理上总结西周的乐政体系。当然，这些乐论话语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尚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但因为这些乐论话语的言说主体有着相近的知识素养，故存在共同的理论聚焦和政治关切，可以相互补充。这表现在，将“德礼观念”确立为周代乐政的价值内涵，将“和平之声”确立为周代乐政的生成条件，由心、耳关系反映出周代乐政的运作机理，由“乐以殖财”实现周代乐政的作用效果等。这些乐论话语紧紧围绕着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为孔子以后儒家乐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进入战国之后，先秦诸子在周代礼乐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不同的音乐理论。其中，儒家全面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乐政体系和乐论知识，并从学理上进行了思想深化和理论建构，从而形成了众多体系完备、逻辑自洽的乐论文本，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乐记》。

《乐记》首先对“乐”的逻辑结构进行分解，将之分为“声”“音”“乐”三个部分，并分别赋予三者不同的价值内涵，如“声”是个体情感的简单宣泄；“音”除了具备一定的审美意义外，还是省察政治得失的重要标准；“乐”则代表了儒家乐论的最高审美层次，不但是理想的道德伦理象征符号，更是一套系统而复杂的政教体系。其次，《乐记》还引入了心、性、情等概念，将儒家的音乐理论纳入性情论的范畴之中，为乐政体系寻求学理依据。最后，《乐记》还重点讨论了儒家乐政的实现途径，即通过“反情和志”和“广乐成教”两种方式来说化人心，最终达到由个体之治到群体之治的政治目标。

## 周代乐政的研究价值

对周代乐政进行整体性观照，价值是多方面的。

**1.乐政与制度。**乐政体系的形成，构建了早期中国行政体制的重要框架和运作模式。可以说，自周代以降，礼乐制度就被高度政治化了，周公的制礼作乐，不但是政治制度的创制，更是国家治理手段的革新。故立足于乐政这一概念，一方面可以在整合礼乐关系的基础上，突出乐在社会政治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构建乐政体系的过程中，将之作为考察周代制度演进和社会演化的重要动因。

**2.乐政与思想。**乐政体系在构建之初，就被赋予了“德”的价值内涵。随着王官之学的解体，春秋时期的知识人不断地对乐政体系进行学理总结，挖掘出了“和”“平”“中音”等概念；进入战国时期并延续到汉代，儒学学派在继承周代乐政体系的基础上，更是进行了哲理的升华，并从人性论、宇宙论等层面进行了相关的论证。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一直以来的思考对象。故通过对周代乐政体系的学理建构，可以做到思想史、学术史和哲学史相互贯通。

**3.乐政与文学。**近人言及先秦文学，往往谓诗、乐、舞合一。故对周乐进行研究，也是对先秦文学研究的深化。所以从乐政的层面对文学展开审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对文学观念的生成来说，“周文”的形成就与周代的乐仪之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对文学活动的实现来说，周代的乐官首先就是文学活动的重要实践主体和生产主体。而周代文学活动的展开，很多也是依托于音乐的形式，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模式，对于“制度文学”或“文学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摘自2021年1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 百年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变革

李 滨

世界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世界结构，它一方面规定着国家形态，影响着国内的秩序；另一方面规定着国家间在国际上互动的方式，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整个世界真正互为联动、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是因为当时的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所致。因此，谈论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的关联性只能从这一时期开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欧美古典自由主义危机，世界涌现的有影响的思潮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其相应的变种、苏联式社会主义以及英美的改良式自由主义。这些思潮影响着当时的世界秩序的变革，形成了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时代。这一“大转型”造就了一个混乱的世界秩序。法西斯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与英美改良式自由主义竞相塑造或维护一个以自己为主导的世界秩序。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竞争尘埃落定，把世界大体分成了两个部分、两个阵营——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分属两个阵营的国家大体按阵营的塑造者要求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体制，而且彼此按相互默认为的规则进行互动。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反殖民主义，世界性反殖民主义运动蓬勃兴起，众多被奴役民族获得解放，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然而，在两种世界秩序的影响下，一些新兴民族在获得新生的过程中，以内战形式选择国家体制；独立后虽然许多国家想在两个世界之间“不选边站队”，但现实使它们不得不在美苏之间做出选择，陷入美苏之间的“冷战”之中。

历史辩证法使得美苏阵营之间数十年的竞争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在经历战后20多年的黄金年代后，又出现了一股历史的“返祖”现象，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以新的形式再度勃兴。几乎所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按新自由主义规范重塑了自己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世界按新自由主义模式重新确定了国家间经济互动模式，美国领导的军事政治同盟承担着“管理”（police）世界职责。但是，犹如百年前的“大转型”一样，新自由主义也给世界带来了类似的社会矛盾，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年引发“大转型”的社会基础又在世界许多地区重新显现。

综观百年世界风云，贯穿历史主线的最主要思潮之一是欧美自由主义。百年间自由主义经历了变化起伏，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改良式自由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的变化过程。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精髓是一致的，即在经济上强调“私有制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市场自由是经济自由的体现；政治上相应的制衡制度是作为财产保护、市场自由的政治保障，因为“只有自由处置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竞争体制，民主才有可能”。而改良式自由主义与此不同的是，承认自我管理的市场存在着重大缺陷和对社会的负面作用，强调用国家干预来弥补自由市场的不足，维护市场的长期发展。新自由主义继承古典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和谐“假说”，认为“理性”的个人在市场中按自己的特长参与分工，通过市场交换使个人与集体的福利都得到增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由此导致追求私利的个体在市场交换机制中实现利益的

互补与增进，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在国际层面，自由贸易同样也达到这种效果，国家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交换实现国家间利益的互补与增进，从而保障了国际和平与稳定。这被孟德斯鸠总结为“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平”。而改良式自由主义则认为，自由市场无法实现这种和谐功能，只有通过国家的干预和国际协调才能实现个体利益的兼顾。

百年间伴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变化，不仅带来的是一种国家社会的大变化，也带来了整个国际秩序的相应转型。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占主导地位相关联，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在百年间改革和变化相对应。

古典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衰落，以一种改良式自由主义——也有人称“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的形式在美英一些西方国家得以存在，但最终新自由主义形式再度复兴。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都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对立衍生物。当今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矛盾是否会产生类似百年前的各种政治思潮冲击既有的世界秩序？这是关系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回顾百年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的关联史，希望人类对此有所启迪，能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推动历史的进步，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百年的政治思潮可以说都是主要围绕着欧美自由主义思潮这条主线而展开的。自由主义的百年轮回导致当今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世界必然重复过去古典自由主义的故事。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缺乏有效治理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体制必然带来贫富分化、经济危机，因为市场竞争即使没有私有制也会导致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与滞后性，也会导致贫富分化；而经济痛苦与贫富分化必然滋生极端民族主义、政治极端主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化的条件下，这种极端政治倾向相比过去更具传染性和自我固化特征。极端的政

治倾向是社会与国际对立的基础。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如同百年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危机一样，正在酝酿着世界的变革。目前比较有影响的变革思潮包括：一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包括西欧的一些极右翼势力），它调动民粹思潮和民族主义冲击着自由主义传统，力图重塑世界秩序；这种秩序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以“美国优先”的特权与其他国家交往。二是一种“再嵌入式自由主义”（Re-embedded Liberalism），它以西方传统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为主要代表。比如戴维·莱克（David Lake）在2017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上所做的有关“再嵌入”的主席演讲就颇具代表性。这一演讲的核心就是在国内重拾罗斯福“新政”精髓，推行一种“新新政”（New New Deal），以应对美国国内严峻的社会分化；在国际上，继续重视“共享收益”（Shared Gains）和多边主义，在“新型国际协商”（New International Bargain）基础上挽救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不断流失的合法性，以应对中国崛起等一系列国际挑战。新当选美国总统的拜登大体上属于这种势力的阵营。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制度模式供其他国家选择借鉴，但不搞制度输出；并且在照顾世界各类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尊重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基础上，按“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革全球治理方式，推动国际关系向“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修正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各种弊端。这三种改革势力都代表着一种国内制度，都提出一种国家交往的模式。

（作者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需把握好四对“关系”

高长武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确定了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并提出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开启新征程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具体要求。在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征程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从方法论上讲，要特别注意把握和处理好如下四对辩证统一关系。

## 守正与创新

在文化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守正创新。所谓“守正”，就是遵循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传承和弘扬我们党在长期的文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谓“创新”，就是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也就是在守正的基础上，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见微知著”的敏锐，立足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顺应时代条件变化和时代潮流发展，努力推进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创新，充分激活、释放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努力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守正与创新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坚持守正，文化建设才能沿着正确方向、恪守正道行稳致远，创新也才可能有坚实依托；创新是守正的延续和发展，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文化建设才能得到更多的发展动力和生机活力，也才能更好地守正。因此，必须把守正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守正不渝、创新不止。

## 坚定文化自信与借鉴吸收外来

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然要求坚定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实现文化自立、做到文化自觉、达到文化自强。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想文化力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从总体上讲，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仍然是“西强东弱”。西方发达国家精心包装并不遗余力推销其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宣扬和鼓吹“西方文化优越论”“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所谓“普世价值”，刻意打压和消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自信。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定文化自信不仅是必然要求，更是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另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决不是固步自封、

封闭排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还需要注意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文化成果，做到吸收外来、洋为中用。每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人群中产生和发展的，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相应地也都有需要丰富和提高之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任何一种文化，不管它曾经如何辉煌，如果陶醉于过往的辉煌，固步自封、封闭排外，必然会陷入僵化、走向衰败，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把坚定文化自信与吸收外来结合起来，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要善于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又要在坚持以我为主、择善而从的原则基础上，积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有益成果，不断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 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建议》强调：“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

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奋斗目标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社会主义”，一是“强”。前者决定了我国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后者则决定了我国文化建设在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基础上，还要有更高的追求，即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这就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必须把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统一起来，把服

务群众与教育群众联系起来，把增加文化产品的数量与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结合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上述变化，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总的来讲就是，大力提升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内容健康向上、种类丰富多样、形式为群众喜闻乐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的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既能更好满足不同阶层人民群众的多元文化需求，又能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使人民在精神上既富足又强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强大精神力量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需要精心培育的。通过提供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在有效满足人民文化需要中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在着力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更好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有机统一，就是精心培育和形成这种强大精神力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把文化发展和建设工作划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大范畴，坚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两手抓，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文化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建议》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中国文化建设理论主题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曹润青 冯鹏志

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历史性相遇中受到了全面的冲击，无论是器物、制度还是科学、文化，都无力与西方抗衡，在溃败之余，中华民族意识到中国正在经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在民族危亡、文化陷落的历史背景下，西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思潮在中国文化场中涌动、冲突，造成了中国社会内部文化解体、价值失序的混乱局面。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面对这一事关文化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为文化建设的主题，使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广泛文化实践有了明确的理论旗帜与

价值指引，为中国文化发展在根本上指明了出路，由此也汇聚了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形态的强大合力。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题的确立与“二为”方针的提出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为党领导下的文化建设确立了根本主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两个基本着力点。二者互补共生、密不可分。文化事业只有紧密依托文化产业，才能有效聚合更多市场要素和资源从而获得不断发展壮大的广泛支撑，文化产业只有充分承载文化事业，才能明确方向、站稳立场从而获得健康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就是着眼于有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充分保障人民文化基本权益、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网络，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总量供给，缩小城乡公共文

化服务差距，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繁荣发展文化产业，就是要以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为主要衡量标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无论是发展文化事业还是发展文化产业，从根本上说，都要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服从服务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摘自2021年1月13日《中国文化报》）

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的提出，使毛泽东极为重视和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意义，强调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批评艺术作品中的非无产阶级立场倾向。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并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具体规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题下进行文化建设的实质起点。与之相适应，在文化实践上，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思想问题“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理清了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存在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张使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特点、民族形式，强调要善于从中国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射中国实践之“的”。面对文化实践这一中国之“的”，毛泽东在深刻把握中国革命实践要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题进一步具体化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针，认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可以看到，“二为”方针作为毛泽东同志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主题下对文化建设提出的具体规定，将文化视作革命的武器，带有强烈的实践指向、问题意识，适应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需要，帮助党成功肃清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建构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毛泽东同志带领全党在革命时期探索文化建设取得的重大理论成就。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题的发展与 “二为”方针的更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建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文化建设中要求进行自主发展的倾向也越来越突出。然而，受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错误影响，“二为”方针被教条化，文化问题被无限泛化、上升为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完全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严重压缩了文化发展的空间，抑制了文化建设的自主性，致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遭遇重大挫折。

“二为”方针曾在革命时期对党引领文化建设发挥了根本的指导作用，然而由于党未能根据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对“二为”方针做出相应调整，导致理论在指导实践上显现出历史的局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展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恢复。在党对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调整的历史背景下，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曾经被高度教条化的“二为”方针被更新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精神与要

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题在改革实践中的重大发展，成为贯穿改革开放时期党引领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新的“二为”方针反映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需要，体现了党的文化理论的成熟，充分释放了全社会文化发展的蓬勃活力，推动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教育、科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推动，人文社会科学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文艺的审美价值得到确立和尊重，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公共文化迅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活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文化蓬勃发展的生动格局。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题的成熟与 “文化自信”思想的提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在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根本要求的前提下，在坚持“二为”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极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题，极大增强了党对文化建设的理论引领，是新时代党推动文化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的行动指南。

文化自信的提出把握和回应了世界历史出现的重大转折。当前中国正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世界之乱”与“中国之治”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背景：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衰退与发展低潮；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正在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面对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及意识形态偏见，不断制造“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试图否认中国

道路的合法性；同时，国内却有一部分人丧失精神独立性和自主性，在精神上迎合西方，陷入精神自卑的泥沼。为了更好应对国内外的风险挑战，必须讲清楚中国道路的道义基础及价值信念，从文化观念上对中国道路的合理性及先进性进行整体论证，消除外界对中国道路的误解与偏见，并在精神上完成自主性的建构，从而更加充分地利用好重大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将文化建设纳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中，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自信的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将文化自信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并将文化自信放在“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和“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地位上加以界定，表明文化自信作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理论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极大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化自信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理论主题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体现了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开启了在更高水平上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摘自《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原题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的主题、本质与道路》）



# “解构凡尔赛”的社会文化症候

周思妤

## “回溯”的炫耀和嘲讽的共同体

最早的“凡尔赛学”由网友小奶球开创，她最初留意到这种现象是因为朋友向她吐槽，有人每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高端”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淡淡”的优越感。小奶球在接受采访时说：“就想用这个词来嘲讽那些人，他们无疑就是想用一种‘朴实无华’的语气来表达高人一等的感觉。”而随后诞生的豆瓣“凡尔赛学研习小组”的主要内容就是分享身边“凡值”高的人，大家一起分析其“凡”意所在。

随着蒙淇淇一系列微博的蹿红，网友纷纷模仿，创作自己的“凡尔赛文学”：说出来挺不好意思，我是最近才知道鸡蛋有壳，以前都是吃管家剥好的，一直以为鸡蛋都是白色的软软的；新西兰进口天然冰川弱碱性水真难喝，再也不买三千块以下的水了……这一系列模仿都是以嘲讽为主要目的，所以模仿的内容和方式也格外夸张，让观者会心一笑，似乎和发出“凡言凡语”的玩梗网友们形成了一个嘲讽“凡尔赛文学”的共同体。

通过对“凡尔赛文学”的追本溯源我们发现，“凡尔赛文学”自其诞生之初就带着嘲讽内涵。在这一嘲讽的共同体中，作为被嘲讽对象的“凡尔赛人”本身似乎并不重要。

“凡尔赛文学”并不先于对它的嘲讽而存在，这不是时间意义上的先后，而是“回溯”层面上的构成。如今对“凡尔赛文学”的嘲讽愈演愈烈，已经完全超过了现象本身。当对一种现象的批评远远大于现象本身的时候，这种批评也就成了一种新的现象，展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症候。“回溯”的“凡尔赛文学”意味着，正是出

于对“对炫耀的嘲讽”的需要，“炫耀”才回溯性地出现了。当一个炫耀的人被成千上万嘲讽的网友围攻时，真正的社会症候不再是炫耀，而是“对炫耀的嘲讽”这一解构本身。为了实现这种嘲讽，“炫耀”反而成了为了嘲讽而出现的東西。炫耀的共同体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嘲讽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是否有人炫耀都不重要，其逻辑正像那句著名的小品台词：“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 “凡尔赛”之“圣状”

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凡尔赛文学”的第二个独特层面了——为什么遭解构之后“凡尔赛文学”并未消失？

心理学家发现，有的人生病后明明身体已经康复，却仍然认为自己病入膏肓，夸大自己的疾病和痛苦，这种症状被称为“孟乔森综合症”。拉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晚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精神病患者的症状得到恰当阐释时就会消解，但是拉康发现，有一些症状即使得到了阐释也不会消解，于是他发明了“圣状”一词来指代这种无法消除的症状。

在孟乔森综合症中，患者往往通过夸大疾病来博取同情。同样，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圣状”作为症状本身不再重要，关键在于“圣状”为患者博取的其他东西，而正是这种东西让患者宁愿饱受“圣状”的折磨也要维持它。

遭遇解构也不曾消失的“凡尔赛文学”不正是一种“圣状”么？人们宁愿不断创作“凡尔赛文学”，哪怕是展示自己羞耻的“凡尔赛史”，

也要维持作为解构的嘲讽本身。回溯构成的炫耀不正是小品台词里的“困难”么？“没有炫耀创造炫耀也要嘲讽”，嘲讽作为人们享受的根本内核，支撑着“凡尔赛文学”再创作的狂欢。我们不能消除“炫耀”，正如我们不能消除“困难”。拉康的“圣状”维系着主体的基本存在，是抵制精神崩溃的防线。同样，作为“圣状”的“凡尔赛文学”也通过保持嘲讽的解构性距离，将我们同无法直面的阶层差异之创伤隔离开来。“凡尔赛文学”的前提是对自己所不熟悉生活圈子的预设立场。然而，这里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所呈现的生活是真是假，是日常表达还是“凡尔赛”炫耀。无论我们面对的是他人的日常表达还是“凡尔赛”炫耀，对“凡尔赛文学”的嘲讽和解构依旧是一种社会文化症候。

### 作为症候的解构

我们对“凡尔赛文学”的解构是在抵抗什么？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娱乐的功能就在于“阶级差异的平等化”，它让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获得相同的平等感，最终使得人们“不再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对“凡尔赛文学”的解构狂欢本身不正是这样一种娱乐么？人们拼命抵制“炫耀”，坚守“内心的真实”，不正包含着对阶

层差异的不安和恐惧么？当我们努力解构“凡尔赛文学”时，经济地位、政治权利、文化价值上的不平等也同样被解构了。

电影《西虹市首富》中一个有趣的桥段与对“凡尔赛文学”的解构相互呼应：一夜暴富的王多鱼来到全市最豪华的酒店，最初彬彬有礼、原则明确、要求客人身着正装的酒店经理在得知王多鱼是亿万富翁之后，马上换了一副接地气的店小二做派，而随后镜头一转，王多鱼带领的球员们在高端的西式宴席上手脚并用，争夺食物，完全不顾所谓的“高雅礼节”。类似的场面在当下的商业电影和网络文学中屡见不鲜：底层逆袭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构那一套“不接地气”的繁文缛节，让那些假模假式的精英拜倒在自己的权力之下。这种新的逆袭想象不再是从前的“成为精英”，而是“解构精英”——当阶层差异逐渐固定下来，当跨阶层逆袭的想象基础逐渐消失，人们不再想象一种阶层上升，而是通过想象性解构彻底抹平阶层差异。

苹果公司的产品都是傻子才买的“智商税”、旅游只是为了发朋友圈炫耀、豪车不过是“梅进故宫”的笑料，阶层差异逐渐成为网友们争相调侃的梗，在嘲讽共同体的笑声中消弭了自身的冲击。“凡尔赛文学”不也是如此么？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摘自2021年1月14日《社会科学报》）

#### · 相关阅读 ·

## 凡尔赛/凡尔赛文学

“凡尔赛”即凡尔赛宫，是巴黎著名的宫殿之一。网络热词“凡尔赛”源自日本少女漫画《凡尔赛玫瑰》，其中刻画了十八世纪末凡尔赛宫的浮华奢靡。今天网友们以“凡尔赛”借指刻意炫耀高档、奢华生活的做派。凡尔赛文学的经典套路是：不经意地用反向表述来炫耀自己的优越感——先抑后扬，明贬暗褒，有时再加上适当的自问自答，

草蛇灰线地流露出“贵族生活的线索”。“凡尔赛”一词实际上也用于调侃。精通“凡尔赛/凡尔赛文学”的人，被戏称为“凡人”或“凡学大师”。随着“凡尔赛”“凡尔赛文学”爆火，还衍生出了“入门凡”“低级凡”“高级凡”等不同级别的装腔作势。

（摘自2021年1月1日《语言文字周报》，  
原题为《2020年“十大网络流行语”正式发布》）

# 二十四史的由来

黄金生

自文字出现以来，中国就有了连续不断的文献记载，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自然现象的种种变迁。绵延不断的文献记载不仅清晰勾画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而且形成了数量浩繁的文献典籍。而在所有的历史文献中，二十四史无疑是公认的最重要、最具有研究和参考价值的文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延续的详细记录。

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共有三千二百二十九卷，约4700万字。从第一部《史记》记载的上限黄帝算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述的下限崇祯十七年（1644年）为止，记述中国历史赅续4000多年。在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记》是完全的通史，《南史》《北史》是将几个断代连续起来的通史，其余都是皇朝断代史，即完整地记述一代皇朝之始末。断代史首尾衔接，这样，中国从黄帝以来的历史均有文字记述。

二十四史是到清朝才出现的称谓。最早出现的名称是“三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吴王孙权曾对吕蒙说：“我掌管军政事务以来，阅读‘三史’和各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补益。”《东观汉记》到唐朝中期以后逐渐亡佚，中唐以后的“三史”，一般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从魏晋以至唐朝，三史往往与六经并列，称“六经三史”。后来加上《三国志》，称为四史，也叫“前四史”。唐朝还

有“十三史”的说法，出现了像吴武陵《十三代史驳议》之类的书。“十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到了宋朝，又有“十七史”之名，如南宋史学家吕祖谦就编了一部《十七史详解》。十七史，就是在十三史之外，再加上《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元军押解到大都以后，就曾说过“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话。明朝在十七史以外，加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称为二十一史。顾炎武主张“二十一史”加上《旧唐书》，合刊为“二十二史”，但未得官方承认。乾隆时期出现的“二十二史”称谓，是增加清朝官修的《明史》。此时在乾隆的批准下，《旧唐书》终于“转正”，是为“二十三史”。乾隆朝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初薛居正等修的《五代史》（为了与欧阳修的《五代史》区别起见，此书称《旧五代史》，欧书称《新五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二十四史”。

《隋书·经籍志》的序说：继《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之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当乾隆钦定“二十四史”以后，“正史”一称就被“二十四史”所专有，取得了“正统”史书的尊崇地位。

1920年，柯劭志完成《新元史》。次年，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明令将《新元史》定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同意将《新元史》列入，而主张将《清

史稿》列为第二十五史，或者主张将两书都列入正史，于是又有了“二十六史”之名。然而“二十六史”不过是学界的一个说法，没有像“二十四史”那样得到官方的律令式的确认。

二十四史之所以被称为正史，既与这些史书在中国史部书籍中的地位有关，也与历代皇朝宣扬正统观念有密切联系。

将二十四史视为正史，虽然到清朝才真正地明确下来，但其实唐朝以后的统治者已有这个思想倾向了。唐朝设立史馆，由宰相监修前代史，以后形成制度，即当一个新朝建立的时候，都要修前朝史。修史的目的，一是总结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二是通过书写历史来宣布自己的胜利，证明本朝的合法性。唐朝以后的封建王朝，对修史工作都很重视。一般是皇帝特下诏书，明确正统，委派宰相监修。修成的史书遂成为钦定近代历史教科书，并且排挤前朝的同类史书。朝廷牢牢掌握修史大权，禁止民间私修国史。这样，一朝一史的局面逐步形成。“正史”也因此被打上了官方色彩。

政治家讲正统，是争取本朝在历史顺序和现实格局中的地位。从《汉书》开始，“正统论”便成为史家修史的指导思想。三国时期，魏、蜀、吴割据几十年，魏、吴均有史官修其国史，推奉正朔，各为正统。而陈寿做《三国志》，不再局限于魏、蜀、吴各自为政，用统一的眼光剪裁三国国史，反映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最后进入一统的客观历史过程。记述三国史事，有合有分，合则为一整体，纪魏而传蜀、吴；分则各存系统，各为正朔、各有纲纪。南北朝时期，政权对峙，各为“正统”，所修“国史”无不为自己政权多所讳饰，对并存的其他政权多所诋毁，三部断代纪传史——《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南指北为索虏”“北指南为岛夷”。南北各国“莫不自命正朔”而指斥对方为僭伪，南北方都重视自己在史书中的位置。辽金宋元时正统之争再次发生。宋初不承认梁（朱温建立的后

梁）为正统，但欧阳修认为梁有土地、人民和社稷，不得斥梁为伪，这是为了宋的统系，而不得不承认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为正统。元代修史，杨维桢等人主张以宋为正统，以辽金为载记；有人主张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辽金为北史。最后，脱脱采用“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折中办法，认为三史各与正统，即承认辽金宋的正统地位，从而承认元续辽金宋的历史地位。

在明代，学者对于元代“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修成的三史很不满意，于是，重修三朝史的建议又多次被提出，杨维桢的主张得到学者的赞同。王洙修成《宋史质》一百卷，以宋为正统，立本纪，将辽、金列为外国，并且尽削有元一代之年号，不承认元朝为正统，于南宋末便以明朝继之。清朝修史，对华夏族人的正统观念十分敏感，在三朝正统问题上，认可杨维桢之说，以元承宋为正统而排斥辽、金，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自班固著《汉书》，“正史”便成为史学的重要门类。《汉书》以一个皇朝为“正统”，符合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开创了“国亡史作”的先端，其后备“正史”多沿用其例。不可否认，这样所编修的“正史”不可避免出现曲从权贵、为统治者“溢美”“隐恶”的情况，但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和精神一直存在，“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思想一直是古代史学的主流思想。而且，用正统观念把历史联系起来，国家政权被列入“正统”系列而取得了在历史上的联系，并使文化制度也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载体。

所以，二十四史中虽不免存在糟粕，但从总体上说，它们是认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材料，是文化遗产的瑰宝，并对今天的人们一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第1期）

# 走向共同富裕 要做好五件事

李 实

**第一，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新平衡。**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富裕，第二是共同分享。这意味着富裕是第一位的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在劳动力供给相对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保持较高速增长只能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只能依靠不断的创新和技术进步。这些都离不开激励安排进一步完善的分配制度，离不开充分考虑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需要实行一定程度的收入再分配，但这样的制度安排必须把握好分寸尺度，以不伤害经济发展效率为原则。换言之，关键在于寻求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一种新平衡。

**第二，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含义。**

首先，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不等于“财富均等”。即使到了实现了共同富裕的阶段，收入和财富差距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每个人的收入和财富都达到生活水平上的富裕标准；二是收入和财富差距与现状相比明显减小；三是基本消除不合理收入和财富差距。其次，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从2021年起，我国将迈入第一阶段，目标是“取得实质性进展”，而非实现最终目标。

**第三，进一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受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影响，不同人群在获得发展机会上有所不同，直接影响到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差距的产生。因此，保障人力资本积累的公平性是缩小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差距的最重要途径。中国收入

差距研究近期成果表明，个人学历差别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差别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努力，更受不同成长环境及其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影响。特别在儿童成长阶段，家庭条件和社区环境对一个人的发展能力影响甚巨。因此，实现公共资源分配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在具体行动中。

**第四，以人的生命周期为参照平衡发展与共享的关系。**

人的一生经历3个阶段，即成长学习阶段、工作阶段、退休阶段。3个阶段对效率与公平的要求有所不同，工作阶段更应该强调效率，就业者获得收入和公共服务主要取决于其能力和贡献，不言而喻，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第五，进一步理顺分配秩序，让分配结果更为合理。**

中国仍然没有摆脱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的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特征，仍然没有改变很大部分人口为低收入人群的格局。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收入再分配政策体系，是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选择。在再分配领域，重点是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摘自《半月谈》2021年第1期）

# 促进灵活就业 拓宽就业渠道

张成刚 张 岩

2020年7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把支持灵活就业作为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的重要举措，清理取消对灵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意见》从国家层面指明了灵活就业的发展方向，为灵活就业市场政策的制度安排明确了规制走向。近期出台的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也提及“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这都要求我们坚持市场引领和政府引导并重，放开搞活和规范有序并举，为灵活就业发展提供顶层设计，鼓励将个体经营、非全日制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作为拓宽就业渠道的途径。

## 灵活就业成为供需双方的新需要

从企业角度看，灵活用工满足企业弹性用工、短期用工需求。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招聘难、用人贵成为企业招聘中长期存在的痛点，灵活用工不失为重要解决途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灵活用工方式展现了员工补给灵活化、用工效率提升、人岗匹配高效的优势。

从劳动者角度看，灵活用工提升劳动者个人价值。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劳动者通过自由选择工作时间、环境、内容、团队等，组合多种用工形式，既满足个人需求，又能发挥自身所长。疫情期间，劳动者处于居家状态，灵活用工帮助劳动者发挥个人技能、释放自身价值，实现多场景的“价值变现”。

从人力资源服务商角度看，灵活用工为客户和劳动者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对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而言，灵活用工释放劳动者个体的空余时间和企业的弹性需求，并非简单的信息对接，而是结合大数据高效、实时的供需匹配。

## 灵活就业是应对不确定环境的重要手段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因骤增的成本迫切需要降本增效，灵活就业成为疫情下稳就业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越发规范，出于合规而又能降低成本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灵活用工，求职者通过灵活用工模式能随时随地找工作，突破了原有的稳定用工的束缚。

受疫情影响，从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群体在扩大。2020年8月，人社部宣布当前国内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达到2亿左右。灵活用工已成为伴随数字经济发展而自然兴起的就业形式，将成为“十四五”期间解决进城务工、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缓解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面临的招工难、招工贵等问题的重要途径。

由于“灵活用工”快速增长，伴随而生的灵活用工平台和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也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一是灵活就业经营者平台出现。它是指以信息化手段链接灵活就业（经营）用户和企业用户，提供业务发布、承揽、转发、结算和保障等一系列服务的网络载体。目前，国内灵活就业经营者平台仍处于探索成长期，仅有个别企业探索出良性发展的道路。

二是传统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呈现灵活用工发展趋势。我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以中小型企业居多，但业务线相对传统且单一，专业化程度不高，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但从长远来看，人力资源服务业将呈现出人才驱动专业化、技术驱动效率化、常规业务多元化、竞争格局外向化的发展趋势。

### 灵活就业需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

灵活就业作为新兴就业方式必然面临着一些挑战，突出表现在劳动者权益亟需保障上。

首先是制度层面的调整。当零工经济、灵活用工越发成为一种用工常态时，我们一方面需要有相适应的政策、法律条款对其生长进行约束，另一方面，也要保障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充分考虑企业用工成本，避免造成市场僵化、灵活性降低。

其次是灵活用工方式本身还存在着从业者流动性大、企业员工匹配度较低、员工到岗率低、监管难度较高等问题，当前尚未制定出一套十分契合灵活用工方式的规章制度。再加上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强，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制度不完善，部分务工者缴纳社保费用积极性不高，造成灵活就业者难以被社会保障覆盖。

为使灵活就业模式更规范、更完善，更好地发挥做大做活就业蓄水池的功能，多地政府出台政策文件支持灵活就业有序规范发展。

### 让灵活就业释放更大能量

一是强化政策保障，让灵活就业有序、健康发展。“十四五”期间，灵活就业发展方向应以劳动力市场实际为基础，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改善就业创业环境，支持灵活就业规范有序发展，不断培育劳动力市场新动能。

二是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以中小企业为重点，开

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活动，推动行业协会制定用工规范和劳动标准，监督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业与相关企业规范用工。支持行业协会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参与统筹当地人力资源服务业的业务导向，疏通企业向上反馈机制，发挥行业协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调沟通作用。

三是鼓励有特色的第三方人力资源外包企业发挥引领作用。支持有特色成长中的第三方人力资源外包企业的发展，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经营方式，探索研究中小企业劳动法律适用部分豁免，重视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科技人才培养的财税激励政策。

四是重视“平台的平台”——灵活就业经营者平台的发展。它将政府、平台企业、灵活就业者无缝链接在一起，实现了多方共赢。一方面，灵活就业者以正规的市场主体身份平等地与企业进行合作，享受高效、快捷的灵活就业创业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技术为企业解决了灵活用工转型面临的风险，促进企业降低用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此外，通过和政府共建的大数据协同治理平台，实现对新经济、新业态、新平台从政府监管到协同治理，从而促进灵活就业健康发展。

五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灵活就业者不再“裸泳”。规范企业用工、劳动者以及第三方平台（或传统人力资源服务业）用工的就业环境，规范用工企业、从业者以及灵活就业经营者的行为，确保在面临劳动纠纷时，保障用工方、经营方以及从业者各方的合法权益。要对灵活用工平台进行引导和监督，研究制定并出台符合灵活就业模式长期发展的监管法规，让该模式涉及的多方主体有法可依、良性竞争、健康发展。要加快灵活就业领域标准化体系建设，出台行业服务标准和规范，充分应用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为灵活就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支撑。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  
（摘自《群众》2020年第24期）

#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国际经验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翁仁木

随着全球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层出不穷，带动劳动就业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有别于传统就业方式，新就业形态下的工作方式更加灵活，给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重大挑战。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员数量庞大，职业伤害保障需求迫切。研究国外制度进展情况，可为我国提供一些启示。

## 传统制度框架下的工伤保障

多数国家工伤保障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如果新业态从业人员被认定为与平台企业有劳动关系，则能享受工伤保障。对于没有传统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各国同样面临工伤权益保障缺失的难题。各国对平台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认定不一。比如，在瑞士，根据其法律，Uber司机被认为是雇员，必须参加工伤保险。但在法国，Uber司机不被认为是雇员，无法参加工伤保险。

目前，多数国家对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关系属性都没有定论，因此，其能否享受工伤保障关键是看原有制度框架下是否有参保途径。总的来看，在传统制度框架下，没有劳动关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保障缺失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但有些已经突破劳动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新业态从业人员具有参保途径，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部分国家灵活就业人员可以享受工伤保障，但没有独立的工伤保险制度和基金，工伤保险待遇分别由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负责。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是加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但待遇水平不高，如爱沙尼亚、匈

利、斯洛文尼亚等国。

二是有独立的工伤保险制度和基金。灵活就业人员法定参保或者自愿参保，缴费由个人承担，有些政府会给予一定补贴。比如，新西兰实行全民法定意外事故保险，所有人群均有渠道获得保障。其中，雇员的工作伤害保险费由雇主缴纳，平均费率为收入的0.72%，雇员的非工作伤害保险费用由本人缴纳，费率为收入的1.21%；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承担缴费；无工作收入的公民则由政府缴费。

三是部分国家对灵活就业人群有特殊规定，部分人群有参保渠道。比如，作为现代工伤保险制度的起源地，德国工伤保险制度早已突破劳动关系限制，工伤保险实行行业自治，每个行业工伤保险联合会可以修改条例，将自由职业者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德国交通运输行业工伤保险联合会就将“货物运送”和“乘客运送”纳入覆盖范围。因此，Uber司机和外卖员在德国可以受到保护。

西班牙2007年通过了《自雇者工作条例》，加强了对自雇者的社会保障。对一般自雇者来说，工伤保险是自愿参加，但自雇者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即经济上依赖的自雇者（指自雇者的经济收入主要依赖某一个客户达到75%以上，没有第三方，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组织上独立，该业务是主要收入来源），必须强制参加工伤保险。

## 制定法律补齐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伤保障

对于现有制度无法兼容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情



况，有些国家通过出台新的法案来保护其权益。法国率先行动，2017年出台了相关规定，从事平台就业的“独立劳动者”在某一个平台获取的收入超过5099.64欧元时，该平台必须承担职业伤害保险的成本。平台有两种选择，一是可以通过团体保险方式，涵盖职业事故风险，但是该保险提供的待遇必须不低于法律规定的自愿保险计划。二是可以为独立工作者提供自愿性职业事故保险，也可以对另一种涵盖职业事故的保险计划进行缴费。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台了新的法律。2017年，马来西亚国会通过了《自雇者社会保障法案》，开始推行自雇者工伤保险计划，强制特定领域的自雇者包括网约车、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必须个人缴纳工伤保险费。

2017年，乌拉圭专门针对网约车行业通过了新的税务条例，加强了税务部门、社会保险银行、劳动部、地方政府和平台公司协调合作。总体思路是，简化税务登记程序，方便网约车司机注册，网约车司机必须在税务部门登记才能够从事运营业务，平台公司需要向政府部门开放数据接口。通过注册和正规化方式，解决了网约车司机的社会保障问题。

2020年，印度国会修订通过了《社会保障法令》，其中增加了新的规定，联邦政府和邦政府将设立针对无组织的工人、零工和平台工人的社会保障基金，平台共涉及乘车共享服务、食品和杂货配送服务等9个行业。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联邦政府、邦政府，平台和平台工人的缴费。平台缴费水平为年营业额的1%—2%之间，平台工人的缴费不超过平台向其支付款项的5%。具体实施细则还有待印度政府制定。

## 国际经验给我国的启示

新业态是各国工伤保险面临的共同挑战。考虑到国情不同和制度差异，虽然国外无特别成熟的经验可供直接借鉴，但国外经验仍可给我国一

定的启示。

一是以积极态度应对挑战。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工伤责任属于雇主责任，各国工伤保险制度不适应传统灵活就业人员情况比较普遍，此前态度消极的居多。但新经济新业态兴起后，灵活就业方式更加流行，并将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审视和应对新业态带来的挑战，谋划制度长远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政府规制相对宽松，新业态发展更快，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因此许多国家正考虑通过新法案给予保障。

二是考虑制度长远发展。对于各国工伤保险制度来说，一般是从产业工人起步，逐步向其他职工人群扩展，并向职业人群扩展，甚至保障一般人群如学生，覆盖范围从小到大是普遍规律。新业态兴起后，有些国家优先考虑平台从业人员，也有的国家一揽子解决灵活就业人群职业伤害保障问题。无论何种方式，从制度长远发展角度考虑，在制度设计上，应当有政策通道，保障所有灵活就业人员权益。

三是创新管理服务理念。新就业形态与传统就业方式存在诸多不同，在工伤保险经办管理上应当有创新思维。新业态依托信息技术，要求经办管理技术创新和多部门协作，需要平台公司和平台从业人员之间的配合。

四是不断增强制度灵活性和适应性。许多国家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捆绑，但用人单位普遍仅承担缴费责任，对于平台从业人员，也仅考虑由谁缴费。我国工伤保险和劳动关系捆绑更为紧密，用人单位参保缴费后，仍需承担工伤发生后一定经济责任。制度设计时，新业态从业人员除了是缴费主体外，为了保障人群公平，还需考虑事故发生后待遇水平和责任分担。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摘自2021年1月8日《中国劳动保障报》，原题为《注重创新性 增强灵活性——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国际经验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 “公共户”背后的政策理性与温度

盘和林

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关于在户籍派出所设立“公共户”的工作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指出，将在北京全局户籍派出所推动设立“公共户”，以解决暂不具备市内迁移条件的本市户籍人员落户问题，并根据“公共户”临时代管户口的特性，实行“双向强制迁移”的管理措施。所谓“公共户”，与本地常住户口一样，在教育、子女落户、房产交易等层面享受同等权利，但二者的区别在于“公共户”没有户口簿，市民如有使用需求，可凭身份证开具户籍证明。

当前，户口可以看作是享受一个地区社会福利的入场券，即使是长期在某地工作、长期缴税的居民，没有户口仍难享受全部福利。现行户籍制度下，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在社会讨论中长期受到诟病，然而从现实情况看，短时间内取消或是对户籍制度进行大的改动又是不现实的。由此，一些缓冲的措施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北京推出“公共户”正是这样的尝试。这一公共政策体现了人本原则、服务原则、均衡原则等公共管理原则精神。

**人本原则是“公共户”这一公共政策的基础。**根据上述征求意见稿，六类人群可以办理“公共户”落户，其中包括无房无集体户口者、房屋产权交易中的户口迁出者、离职迁出集体户者等。这基本涵盖了在户籍管理中容易出现问题的主要人群，该项政策的出台将让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等诸多现实问题迎刃而解，鲜活地体现了以人民生活为落脚点、以人民需求为出发点。

**服务原则是“公共户”这一公共政策实施的依据。**现代公共管理的理念逐渐从管制转向服务，服务是公共管理的内核所在。当前，我国公共管理机构正在加速向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转变，更好为社

会提供便利及价值。拿二手房来讲，当前北京有很多的房屋“空挂户”，原户主虽然已经办理了房产的交接，但户口依旧挂在原处，导致新房主户口无法迁入，或者即使迁入还会面临社会福利被占用的情况，学区房的学位分配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因为“空挂户”的存在，新房主再进行房产交易时房屋将面临较大程度的贬值。因此，“公共户”瞄准居民生活中的难点、痛点精准施策，尽可能地在当前户籍制度环境下做好公共管理服务。特别是，对于一些户口老赖，公安部门将实行强制措施，进行“双向强制迁移”，保证新房主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服务原则。

**均衡原则是“公共户”这一公共政策的效果标尺。**评价一个公共政策的效果，不能只关心是否提高了社会福利，同时应关注社会福利的分配。显然，该征求意见稿对政策施行范围、管理对象作出了较为合理的界定，“公共户”的设立也解决了很大一部分人群的户口转移问题，针对“空挂户”的问题，同时照顾了原房主和新房主的合法权益，基本做到了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除此之外，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公安户籍派出所以年度为单位对“公共户”进行清理，这样也有效降低了执法部门的工作压力。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由于国家政策安排以及城市设计规划都与户籍工作有着密切关联，现有制度不太会“急转弯”，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地区间福利差距依旧不同程度存在，户籍制度改革仍任重而道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需要有“公共户”这样的缓冲政策存在，也需要不断推进创新创造，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摘自2021年1月7日《光明日报》）

# 生态环境领域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庄国泰

在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要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总方针、总依据和总要求，也为做好生态环境领域宣传和动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 深刻把握生态环境领域宣传和动员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3年来，围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不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引导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主旋律持续高昂。各地广泛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参与重大主题成就宣传。2019年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在中国成功举办，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生态环保故事，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是生态环境保护正能量广泛传播。各地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制作推出4.2万多种形式多样的生态环境宣传产品深入宣传《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推选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等先进典型，有的地方还聘请环保形象大使，设立省级

环境保护政府奖，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生态文明的道德风尚。

三是生态环境舆论主动局面更加强化。全国各省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定期举办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重点工作进展，回应社会关注热点问题。

四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渠道不断拓展。4类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深入推进，设施开放单位已达到1239家，累计参访公众达8500万人次。疫情期间，各地探索开展云参观、云开放等线上活动，取得很好效果。

五是社会共建美丽中国热情显著提升。各地充分利用六五环境日、生物多样性日、全国低碳日等重要节点，针对学校、企业、社区、农村等不同群体，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和实践活动。

六是生态环境宣传工作大格局初步形成。各级党委政府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主动性显著增强，党政部门与生态环境部门的宣传合力进一步加强。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领域宣传和动员工作，深化“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依然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

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的严峻形势未根本转变。

二是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是生态环境舆论形势复杂严峻。

四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对宣传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 谋划开创新时期全民参与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一是深化重大理论研究宣传。充分调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闻媒体等力量，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研究，深度挖掘和准确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通过线下线上多种渠道，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是持续推进新闻宣传。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政策举措、进展成效的信息公开力度，规范优化新闻发布工作，加强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主动曝光阻碍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问题，及时通报负面典型案例，有效运用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手段，形成舆论监督合力。加强与新闻媒体的互动，主动设置议题，组织策划好伴随式采访和主题采访，增强新闻报道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增进舆论引导的协同性和有效性。

三是创新开展社会宣传。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加大生态环境宣传产品的制作和传播力度，赋予宣传产品更多文化内涵，从注重宣传产品数量到提升宣传产品质量转变。

四是不断改进新媒体宣传。加强全国生态环境政务新媒体矩阵建设，完善新媒体内容发布、排名、奖惩等机制。

五是稳步加强环境教育。推进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师资队伍建设和从小培养青少年生态文明行为习惯。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学科建设，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推进环境保护职业教育发展。

六是广泛推动社会参与。动员和引导企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传播，主动履行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不断探索创新绿色发展方式。继续推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拓展开放领域和范围，提高开放频次，丰富开放方式，提升开放效果。加大对环保社会组织的引导、支持和培育力度，推动环保社会组织提供环保公益性服务迈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科学化，提升参与现代环

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发展壮大生态环境领域志愿服务力量，建设省、市、县三级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队伍。

## 努力提升宣传和动员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宣传，把宣传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研究解决宣传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资源调配、资金支持、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有力保障，为宣传工作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保障。

二是抓好队伍建设。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强化宣教机构设置，优化配置宣传干部队伍，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全面提升宣传干部队伍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打造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生态环境宣传尖兵。

三是改进工作作风。坚决杜绝宣传工作中的形式主义，要加强调查研究，出台政策、制定方案要符合基层工作实际，反对假、大、空，力戒飘、虚、浮，将工作落实落细。不搞“一阵风”，不仅仅在六五环境日等重要时间节点搞宣传，要将工作落入日常、抓在平常。防止表面文章、场面热闹，不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真正带动社会公众参与进来，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四是勇于探索创新。加强对公众喜爱的宣传方式的研究，善于将专业性的术语转换为群众听得懂、乐意听的语言，不断增强工作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加强对新形势新问题、新技术新手段的学习研究，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变化，加强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大胆探索尝试创新工作方式，主动设置议题，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公众参与创造更好的条件。

（作者为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摘自《中国生态文明》2020年第6期，原题为《努力开创全民行动新局面 谱写美丽中国建设新华章》）

# 实现“碳中和”需坚持系统思维

刘满平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可以说是压力不小。

**一是体量大、任务重。**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330亿吨，我国排放约100亿吨，约占全球三分之一。近几年，发达国家已处于工业化后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已逐步下降，加拿大、日本、欧盟均已实现“碳达峰”。然而，我国当前尚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消耗量及碳排放量仍处于上升阶段。

**二是时间紧。**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从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到“碳中和”普遍有50年至70年的过渡期，我国于2030年达到峰值，再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过渡期只有30年。

**三是能源结构不合理，高碳化石能源占比过高。**我国能源结构是以高碳的化石能源为主，占比达到约85%，其中，煤炭的占比达到57%。

**四是能源利用效率偏低，能耗偏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就业高度依赖高能耗的制造业，单位GDP能耗仍然较高，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的2倍至3倍。

基于上述压力与挑战，预计在“十四五”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减排降碳、低碳发展都将是我国环境治理甚至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主题。

“碳中和”是一个全新的革命，将给我国经济、能源、技术、政策体系带来深刻影响与挑战。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思

想观念的转变、技术的进步、商业模式创新、政策扶持和体制机制保障，还需坚持系统思维，打破各种壁垒和藩篱，避免单兵突进。

**首先是打破能源企业、种类之间的壁垒。**传统能源体系下，煤电油气核等能源体系布局还停留在单一、少数能源种类上，造成能源综合效率低下。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国情现状决定未来需要进行多能互补，实现各类能源融合发展，提高全社会能源整体利用效率。

**其次是打破能源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壁垒。**能源行业虽然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行业，但建筑业、工业、交通等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不少。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仅是能源一个行业部门的事，而是包含众多行业在内的事；不仅是生产领域的事，也是消费领域的事；不仅是能源、环保主管部门的事，也是工业、财政、社保等部门的事。

**再次是打破中央与地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壁垒。**立足全局，统一谋划，统筹处理好局部与全局利益关系，突破部门、区域壁垒，形成“全国一盘棋”，让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并结合政策、管理和技术共同发力。

**最后需打破不同主体之间的壁垒。**“碳中和”涉及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个人等众多不同主体，每个主体在其中具有至关重要又各有侧重的作用。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

（摘自2021年2月3日《经济日报》）

# 蓝天保卫战升级 臭氧将成“十四五”治理重点

李禾

自2013年发布臭氧数据以来，全国臭氧污染浓度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臭氧浓度同比上升6.5%，其中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及周边等重点区域的涨幅更为显著，且年均浓度均超标。臭氧污染防治形势严峻。

## 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四成

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臭氧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占总超标天数的41.8%，导致全国优良天数比率同比损失2.3个百分点。

臭氧已经成为导致部分城市空气质量超标的首要因子。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城市数占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总数的28%，6—9月，其臭氧超标天数占全国总超标天数的70%。

在“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环保领域9项约束性指标中，还有2项指标尚未完成，其中一项就是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指标。

## 生成臭氧的前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

毋庸置疑，臭氧是继PM2.5之后又一影响优良天数的重要因素，臭氧污染是怎么产生的？氮氧化物以及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产生臭氧的两种“原料”，也被称为生成臭氧的前体物。它们在强烈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下，经过光化学反应，就会产生臭氧。温度越高、光照时间越长，

挥发的量也就越大，反应程度越充分，因此，臭氧浓度往往也就更高。

当前，中国臭氧污染形势为何如此严峻？从污染成因看，氮氧化物、VOCs排放量依然居高不下。VOCs排放来源多、分散，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此外，高温少雨等极端天气有利于臭氧的生成，2013—2019年，有5个年份属于最暖年份。2019年9月，多个省份平均气温同比升高，尤其是华北、华东、华南地区，降雨量普遍下降50%，个别地区下降了80%。而且全球臭氧背景值也在不断提升，平均每年上升一微克，欧、美、日等北半球国家的臭氧浓度同样呈现增长的趋势。

## 突出时间精准、空间精准、行业精准

从臭氧污染水平看，中国臭氧污染略高于欧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污染水平高于美国西部地区。总体上，中国臭氧污染水平相当于美国2000年左右的水平，远低于美国1950年前后光化学烟雾事件多发时期的臭氧浓度。

与2019年相比，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的最大变化是，针对臭氧浓度上升问题，夏季实施VOCs（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在“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编制中，特别针对臭氧的两项前体物VOCs、氮氧化物设计减排目标。

在控制VOCs和臭氧污染上要突出时间精准、空间精准、行业精准。时间尺度上聚焦臭氧污染严重的夏季，也就是6—9月份；空间尺度上聚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苏

皖鲁豫交界地区；行业上聚焦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和油品储运销。

生态环境部将出台和采取多种政策、措施指导各地实施 VOCs 治理。其中包括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尽可能使用低 VOCs 含量的产品，相关产品 VOCs 含量限值国家标准已经出台；聚焦于已经安装治污设施的企业，通过提高 VOCs 收集率、治污设施同步运行率及去除率，确保提高综合效率。

### 建立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的大气环境管理框架

打响蓝天保卫战以来，全国空气质量改善取得明显成效。但这些目标都是阶段性的，距离全国所有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在

未来一段时间，持续降低PM2.5浓度仍将是是中国大气环境管理的核心目标，在控制PM2.5污染的同时，强化与臭氧的协同控制，尽快遏制臭氧浓度快速上升的趋势并使之下降，将是蓝天保卫战下一阶段工作的主线。VOCs和氮氧化物是造成PM2.5和臭氧污染的共同前体物。PM2.5与臭氧的协同控制，主要反映在更加科学地开展VOCs和氮氧化物排放控制。因此，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应当根据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的需求，调整污染物减排和污染治理的重点，强化对VOCs与氮氧化物减排要求，从管理理念、控制指标、重点任务、重点措施、环境政策等方面出发，建立支撑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的大气环境管理框架；通过优化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划分、不同时段重点污染物减排策略设计等，形成有利于协同控制和精准治理的大气环境管理体系。

（作者单位：科技日报）

（摘自《世界环境》2020年第5期）

#### · 相关阅读 ·

## 臭氧的前世今生

王 姣

臭氧是氧气的同素异形体，和氧气的化学元素相同但是结构形态不同。在常温下，臭氧是一种有特殊臭味的无色气体。

臭氧主要存在于大气层中的臭氧层，它能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紫外线对皮肤有损伤作用，暴露在紫外线时间过多可能引起晒伤以及皮肤红肿。多亏了有了臭氧层，97%—99%的紫外线辐射被臭氧层吸收，不会到达地表。

但是，一旦臭氧到了近地面，就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一定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空气质量参考指数建议安全臭氧浓度低于每立方米100微克（暴露在污染环境8小时平均值）。当臭氧浓度较低时，会刺激和损害呼吸道，引起咳嗽；浓度增加时，会引发哮喘，同时刺激眼睛；浓度

更高时，会引起头痛，胸痛，损害中枢神经系统，而且这些损伤往往是不可修复的。

除了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外，臭氧浓度过高还对植物造成损伤，降低农作物产量，造成价值350亿美元的粮食减产，并且对全球温度升高有推动作用。

臭氧不是直接由污染源排放，而是在阳光下于大气中产生的。石化、制药、印染、喷涂、化工等行业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氮氧化物，VOCs和氮氧化物等在光照下会释放出氧原子，这些氧原子与大气中的氧分子结合后形成臭氧。汽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会有助于臭氧的产生。

（摘自《世界环境》2020年第5期）

# 坚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李忠杰

## 十字路口的“世界向何处去”

今日世界，有许许多多令人惊喜的发展和进步，但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挑战。比如，信息化、智能化的加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对人类生命的存在形式、活动方式构成了严峻挑战。民粹主义思潮快速发展，社会裂痕越来越大，蒙昧、狂热和暴戾之风日益滋长，长期积淀培育的人类理性正在不断地被抛弃，传统的民主、自由、博爱的价值观正在褪去色彩。民族主义思潮正日益与全球化趋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背道而驰。丛林法则又在死灰复燃。人类长期艰难长成的许多理念和共识，如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多边主义等，都正在被侵蚀，甚至被抛弃。贸易战挑动着世界的神经。一旦失控，极有可能造成许多国家的经济灾难，甚至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许多热点地区战乱不止，大国之间的博弈又在加剧。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和相互猜疑日益增强。不少国家都力图掌握超越对手的军备力量，力图重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希图用武力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尤其是特朗普特立独行、反复无常，突破了許多国际规则的底线，搅乱了既有的国际秩序，制造或激化了世界的众多矛盾。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彻底打乱了人类社会正常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本来这是一个亟需通过合作共赢来战胜人类共同敌人的关键时刻，但西方一些国家单边主义的错误言行，却制造了新的世界分裂，使整个世界滑向危险的方向。

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

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两年来的事实证明，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是正确的。

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正考验着人类的理性和智慧。正确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防止人类再一次走错道路，对于解决当前和未来的一系列问题，确保人类世界继续向着和平美好的方向前进极为重要。

## 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时，明确指出：“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某种意义上，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深层次、全局性的问题作出了坚定有力的回答。

第一，《建议》确认：要“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思想。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们首先要“保持战略定力”，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同时要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第二，《建议》确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处理好机遇与风险的关系，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第三，《建议》确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党和国家一再强调时代主题没有改变。时代主题没有变，原则上，党的基本路线就不能变，和平发展道路就不能变，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也不能变。观察国际形势，必须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四，《建议》确认：“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旗帜是指向，是标识，是态度，是形象。在当今世界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鲜明昭告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内，既是统一思想，又是稳定军心，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坚定地凝神聚力，全面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事业。对外，既是展示形象，又是缓和矛盾，推动世界继续坚持多边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求同存异，共克时艰，维护世界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

第五，《建议》确认：“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复杂情况都不能改变。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第六，《建议》确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和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直面当今世界最重要问题，解决了人们心中最大的困惑，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之所以如此重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这一旗帜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和鼓舞人心，不仅因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多次

党代会郑重宣示的重要立场，而且它实际上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底色，关系着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关系着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关系着人类的命运和未来。

坚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是我们党和国家以最正式、最权威的方式宣布的立场和原则、态度和意志。它是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潮流，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动的走势，坚定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进步而提出的战略性主张。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性质的反映，是由中国党和国家的底色决定的必然选择，是维护和发展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某种计谋和策略，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需要时就用，达到目的后就不用。我们党的多次党代会、全国人大的多次会议、国务院所作的多份政府工作报告，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坚定不移地高举这面旗帜，而且是长期高举，不是一时高举。因此，它在我们的治国方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坚持高举这面旗帜，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既是中国的主张，更是世界的潮流；既是中国自己的行为准则，也是对世界的希望和要求；既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世界的利益；对中国有利，对世界同样有利。因此，中国一直和世界各国一起，推动世界不断地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上前进。

（作者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摘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6期）

#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何 哲

全球治理的格局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各国国内的治理，二是国家间关系的治理。当前的全球治理似乎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

## 全球治理当前存在的普遍问题

当前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皆因主要发达国家在三个基本的行为逻辑上出现了问题，从而引发了其在国内国际两个领域的严重紧张局面。

### 1. 傲慢大于敬畏

#### (1) 对自然的傲慢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对自然充满了敬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各种宗教信仰哲学都充满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这种敬畏，体现为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人类与自然的一种有限的平衡，即人类对大自然索取的有限性。

然而，这种平衡在工业革命后，被彻底地改变了。一方面，人类在科技的进展中，发现地球上并没有存在神祇，从而使得人类轻视和否定了神话传说，并将神话传说中所蕴含的自然观和社会伦理也一并抛弃，从而只信任人类自己本身，人类从此逐渐形成了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人类在抛弃神祇后，确立了以科学为中心的理性信仰观，然而，这种科学，是建立在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之上的逻辑体系，其远远不能解释全部的自然现象。也就是，科学实际上是自然规律的非常有限的局部抽象。然而，在其科学逐步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却利用科学信仰替代了自然信仰，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对自然的傲慢，以科学、进步为名，大肆改造自然甚至破坏

自然的现象屡见不鲜，从而在今天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越来越极端的全球气候如频频的水灾、旱灾、火灾等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近一百万种物种处于濒临灭绝状态。

#### (2) 对科学的傲慢

在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后，是不是人类就确立了对科学的敬畏？事实上，也并没有。以科学为名，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敬畏科学。今天的人类更倾向于信奉科学已有的教条而不是更相信事实。今天的科学界，频频爆发的科研腐败和科研不端，大量的撤稿行为，都表明了人类对科学已经逐渐失去了敬畏，从而使得科学成为部分利益群体谋取利益的工具，这两方面都进一步损害了科学本身的价值。

从此次疫情而言，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人类卫生事业的成功建设，使得大部分发达国家远远高估了自身对疫情的控制能力和低估了此次疫情的破坏水平。对于是否戴口罩，是否某些药物有效，是否应控制人员聚集，是否进行治疗干预等问题，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傲慢和低科学认识。

#### (3) 对人权的傲慢

自启蒙时代以来，人逐渐战胜了神，成为了人类自身的主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普通个体的人权就自然被真正尊重了。在西方国家，大量的弱势群体、底层人群的权利，是不是真的被尊重了，这是需要被质疑的。事实证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资源越来越向精英层集中，从而形成了精英层权利越来越完善，底层人群权利越来越削弱的现象。

尽管20世纪欧洲的福利主义思想的确改善了

普通个体的生存和经济状态，但总体而言，精英层所占据的财富，依然在持续增长。而在美国，这种趋势更为明显。

而从此此次新冠疫情来看，大量的事实证明，对于普遍个体最重要的生命权，西方国家显然保护得非常有限。以群体免疫为名的被动防疫（本质上是毫无作为），显示了西方精英对普通个体生命权的严重漠视。而在疫情并无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的强行重启经济，则又显示出了西方资本精英将普通人更视为劳动工具而非平等的个体。

## 2. 观念大于事实

在发达国家普遍的傲慢之外，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观念大于事实。无论是新冠疫情的控制失败还是普遍的社会矛盾和底层抗议，都体现出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治理中存在着用观念代替事实的问题。

以新冠疫情来看，从头至尾，面对如此重大的全球疫情，西方发达国家一再罔顾事实，用想象中的观念代替社会事实，是造成疫情应对不力的重大原因。

在国际关系角度，无论是从全球气候协定，还是国际贸易争端，都显示出了西方大国对事实的罔顾。例如以气候为例，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全球极端气候频发已经成为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然而，近年来美国却依然在温室气体排放上置若罔闻。美国人均能源消耗量是中国的三倍，然而，2017年6月，美国却悍然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而从全球贸易争端的角度，自上世纪90年代，全球产业链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逐渐开始大的重构。跨国公司将其低利润的生产环节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将高利润的研发和营销等环节留在本国，从而在表面上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的飞速发展而发达国家则进口增多，出口减少。但是，其本质则在于这是同时有利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跨国公司共同的结果：跨国公司得到了利润，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就

业，发达国家得到了资本流入和全球利润税收。然而，近年来，发达国家大国频频挑起贸易争端，试图改变和割裂全球产业和市场的均衡布局，这本质也是用想象中的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损害了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来替代实际的事实。

因此，可以说，用想象的观念代替客观面对的事实，是全球各国治理危机的重要原因。

## 3. 政治大于法律

从制度设计上，政治和法律应该是统一的，然而在具体实践上则会存在冲突。政治家往往会利用民意和手中的权力，在短期操控政治政策，从而破坏法律的长期稳定和理性。在国内是这样，在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通过跨国交往长期实践形成的国际法，也体现出了一种长期理性，而同样会被武断的国际政治行为所破坏。

从当前的全球治理格局而言，这一点显然表现得非常明显。从西方国家国内而言，两极分化的结局显然引发了社会内部的严重对抗，这种对抗在弱势一方表现为大量的街头运动和街头暴力，其中大量的暴力行为显然是违反法律的。然而，强势一方，也就是统治者角度，则运用法律授权以外的暴力试图恢复秩序，例如调动非警察部队来镇压国内的反抗。这两者都显然超过了基于法律限定所形成的非暴力边界。而当统治者采用更为激烈的镇压行动后，弱势一方则同样有理由进行更严重的街头暴力和破坏，从而形成暴力形态的螺旋形上升。而从国际关系而言，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尊重和非暴力协商显然是国际法中的基础原则。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科索沃战争，到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西方大国都屡屡违背这一基本底线，以反恐或者莫须有的罪名来对主权国家发动侵略。这都是将西方国家统治者局部的利益和一时的意志凌驾在全球共同的底线原则之上。

当西方国家在处理国内国际关系都表现为政治大于法律之后，全球治理格局的形态就会变得

紧张起来。基于长期演化形成的群体理性就会被少数统治者的个体武断所替代，从而将本来应该是群体理性的国家变得人格化和任性化，进一步恶化其国内治理和国际关系。

仅仅观察到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其深层次的根源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问题，本质上还是由于一些客观的社会存在和社会状态发生了变化，从而在外在治理行为上表现出来。这些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包括三个，一是全球各国所面临的内部两极分化加剧，二是各国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形成的社会矛盾激化，三是全球新旧力量格局的变化。

### 全球治理秩序恢复的出路和中国的对策

从全球治理秩序的恢复而言，还是要回到治理本身所应有的核心要义上。治理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是群体理性而不是统治者的个体理性。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要重新回到在国内重视人权、法治（民主）、科学、自由、市场、公平，在国际要尊重各国主权、和平和协商的状态。更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在顶层要尊重科学、敬畏自然、尊重法律、尊重其他主体。而在底层，则要降低两极分化，减少精英垄断，促进社会公平，降低底层焦虑和愤怒。

就当前中国的对策而言，西方治理的失败足以为中国提供充分的经验借鉴。苏联的失败，为中国在进一步促进市场改革，保障民生建设，反对官僚腐败，加强执政党建设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今天西方治理的失败，则为我们在国内国际建设的各个方面，同样敲响了警钟。

从国内而言，着重在于：一是要大力促进社会公平建设，避免两极分化。西方大国的治理困境，社会两极分化是其国内的核心根源。两极分化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内部对抗和加大社会暴力行为。因此，当前我国要大力通过税收调节、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转移支付、社会福利体系建设

等，减少两极分化，降低社会内部冲突张力。

二是要减少国内的群体对抗和冲突。无论是美国的族裔冲突还是欧洲的难民问题，都体现出社会内部群体冲突引发的严重后果，对此要高度重视。这就需要一方面在国内用更为公平的措施减少国内不同群体的不公平感。另一方面，对于类似于海外来华移民等问题，要高度慎重，减少新的社会群体矛盾。

三是要进一步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西方此次疫情治理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尊重事实和科学。这提示我们，无论任何时候，事实都是治理的基本出发点，尊重客观规律是治理的基本原则，科学则是治理的基本工具。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环境保护，社会建设，风险防控，疫情控制，都需要进一步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和科学。

四是要各级政府严格坚持依法守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西方大国其政府政策频频凌驾于法律之上引发的后果和内部矛盾当足以引起深思。

五是进一步完善人的权利体系建设。人是社会的主体，在中国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西方国家无论是此次疫情控制失败还是频发的社会冲突，都说明了并未充分保障人权，或以自由为名反而抛弃了对人权的保护。我们要切实尊重人的权利体系，从生存权、发展权、社会权、政治权、信仰权等角度逐步提高公民的权利体系建设。

在国际方面，西方大国对国际规则的破坏，更需要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规则的尊重，从而为世界各国关系交往做出更好的表率，以致致力于全球良性秩序的恢复和重建。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摘自《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 探索管控中美矛盾的路径

傅莹

毋庸讳言，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双方都表达了许多不满和关切。拨开林林总总的复杂表象，根脉性的矛盾在于美国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解误判：美国认定中国要争夺世界霸权，试图取代自己的位置，于是加大对中国的遏制打压；而这在中国人看来就是美国处处阻挡中国前进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程。

恢复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首要条件是准确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中美这样两个强大的国家若因误判而滑向冲突，那将是历史性悲剧，必然要损害两国的根本利益，让许多企业乃至普通民众付出代价，也会给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造成撕裂的压力。事实上，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对自身制度有足够的信心，美国就是想改变中国的制度也做不到。在国际秩序层面，面对众多第三方力量的忧心和疑虑，中美需要解决各自面临的政策路径选择问题——美国是否接受与一个政治制度不同的大国在同一秩序框架内和平共存，中国能否成功地同其他各方一起对现行秩序进行包容性改革。

中美两国政府各自都有繁重的国内事务需要处理，即便未来两国矛盾会继续发展，也需要善加管控，而有效管控中美矛盾的路径并非单一，既要通过积极坦诚的对话和沟通，通过专业高效的危机处理和分歧协调机制，也要通过维护和发展合作，通过在具体问题上解决彼此合理关切。

具体说来，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是展开基于规则和法律的公平竞争。北京重要的是继续倾听和解决在华美企提出的合理关切，持续优化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华盛顿则应该为在美经营的

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高技术领域的企业，提供公平的环境。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中国企业，促进两国企业长久互利发展。

在政治领域，中美应当相互尊重、承认各自政治制度不同、各美其美，营造一种更加平和的气氛。美方指责中国制度或者针对中国的国内政策采取行动令中方反感。当然，中方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同外部世界的沟通，让外界更好地了解中方的立场和意图。

在安全领域，双方都有责任维护和保持亚太地区长久以来的和平、安宁局面。美方需要尊重中国人对国家统一的信念，不要在台湾等问题上挑战中方，或是介入南海领土争议。与此同时，美方可能也感到中国海军成长给其在西太平洋地区带来的压力，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和意想不到的冲突，两国军方可以在战略层面开展对话，以建立有效管理潜在危机的机制，找到和平共处的路径。

在全球层面，中美合作的空间和需求很大，最紧迫的是抗击新冠疫情的合作。应鼓励两国科学家在应对卫生危机上最大限度地发挥相互交流和联合研究的潜力。中国和美国在疫苗研发方面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两国能够携手提高全球疫苗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获益。

此外，在气候变化、经济稳定、数字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议题上，中美如能携手与其他国家同心协力应对这些挑战，多边主义将继续为人类进步带来希望。

(作者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期)

# 警惕美国涉疆涉藏的 “舆论陷阱”和“话语圈套”

王云芳

近年来，美国部分人蓄意制造涉疆涉藏议题，反复编造谎言，炮制错误观点，颠倒黑白，严重违背基本事实。其实质，就是制造和利用“舆论陷阱”和“话语圈套”，操纵国际舆论，政治打压中国，阻碍中国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涉疆涉藏领域的话语造假和恶意中伤可谓层出不穷。从特朗普政府领导层到国会一些议员，他们无视事实和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陆续签署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多个所谓涉疆涉藏法案；部分美国政客不时在社交媒体发文，用混淆视听的话语诋毁中国的治疆政策；美国驻华使领馆不顾事实真相，散布涉疆虚假消息。可以看出，美国涉疆涉藏的舆论宣传伎俩，就是不遗余力地制造耸人听闻的谎言、谣言，杜撰博人眼球的新闻标题，散布耸人听闻的虚假信息，来达到误导国际舆论、歪曲和抹黑中国的目的。

部分美国媒体、政客或反华学者或凭一张扭曲事实的图片，或凭一些断章取义的描述，就编织出无数有违事实的内容。在美国出台的所谓涉疆涉藏法案中，细细推敲就会发现，多处貌似客观、中性的话语描述，其实严重缺乏真凭实据，带有强烈的主观偏见，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等更是美国自我价值观的蛮横输出。美国国会众议院不顾中国人民强烈抵制，最终出台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和“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其中的有关指责并没有确凿的数据来源，纯粹属于美方资助的机构和部分媒体主导的未经证实的错误指控和污蔑之谈。

美方反复炒作所谓“人权、宗教自由问题”，使相关议题不断陷入“解释—炒作—解释”的话语怪圈。对此，中国政府早已多次严正声明和反复强调，涉疆涉藏问题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要求美国政府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政府和部分政客对此置若罔闻，反而多次刻意地、重复地进行相关敏感议题炒作，其目的就是利用宣传炒作手段，玩弄和操纵国际社会舆论，从而扩大对国际舆论的影响。

这种现象在认知心理学中就是“确认偏见”“过滤气泡”和“信息回音室”。美方这种涉疆涉藏话语的臆造和歪曲，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从没去过新疆或西藏的西方民众被这些扭曲、夸张的信息所欺骗，陷入了“话语陷阱”，误以为这些严重缺乏事实依据的臆想和歪曲才是事实，继而继续转发或认可这些虚假信息，形成了谬论反复传播的“话语怪圈”。

面对美方的涉疆涉藏“舆论陷阱”和“话语圈套”，我们要驳斥谬论、澄清事实，理直气壮地向国际社会讲清讲好中国新疆和中国西藏的故事，破除“陷阱”，打破“怪圈”。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只要是不戴着有色眼镜的人都看得出，近几年，新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新疆人权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当前新疆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教授）  
（摘自2021年1月6日《光明日报》）

# 年轻干部怎样做群众的贴心人

孙爱军

年轻干部要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做群众的贴心人，要坚决站稳人民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人民立场体现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反映我们党的根本性质。每名党员都应该牢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必须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要自觉运用群众视角来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把群众当成家人来关心，把群众的信当成家书来读，把群众的事当成家事来办。

**做群众的贴心人，要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深入总结治国理政经验，科学把握时代大势，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党治国理政实践的方方面面，彰显出伟大的时代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就必须始终坚持、全面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经常对照党的性质宗旨，对照初心和使命，审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是真正为了群众，审视政策制定和工作推进过程中是不是充分听取了群众意见，审视工作中是不是切实维护了群众利益。

**做群众的贴心人，要真正把群众小事当成大事来办。**党委和政府作出的决策、制定的政策，往往事关众多群众的前途命运。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理念上要更细致，在关系摆布上要更有度。必须充分认识群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在工作实践中既不能用少部分取代大多数，也不能只讲大多数而忽视少部分，应该统筹兼顾、协调各

方，投入尽可能多的精力、智慧和感情，切实把工作做到位，凝聚起最大的共识。必须科学把握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在工作中需要慎重施策，尊重群众内心感受，两者一致时，通过一步步实现现实利益，来实现长远利益；不一致时，在符合更重要的长远利益前提下，尽最大努力照顾现实利益，同时耐心细致地开展群众工作，切忌一厢情愿、急于求成，主观上认为自己是为了群众好，就可以代替群众作选择。

**做群众的贴心人，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做群众工作同样如此。要建立党委领导下的群众工作机制，对于群众提出的诉求，明确责任，理顺机制，统筹资源，协调解决；并且注重加强分析研判，由点及面、举一反三，从整体上提出科学对策，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健全问题收集、转办、反馈、督查、评价等机制，及时矫正工作中的偏差，使解决问题的过程更符合群众的意愿，充分展现党委和政府开诚布公的胸怀和真抓实干的决心。

群众最朴实，群众也最明智。成为群众的贴心人，不能喊口号、做样子，必须始终以百姓心为心，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切实把党中央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更好肩负起新时代的职责使命。

（作者为山东省聊城市委书记）  
（摘自2021年1月8日《学习时报》）

# 在重大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

熊 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重大工作、重大斗争第一线培养干部、锤炼干部”，“各级党组织要在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组织部门应建立完善在重大斗争一线培养锻炼、考察识别干部工作机制，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引领干部干事创业，推动各项重大斗争任务顺利完成。

**明确地点，搭建干部培养锻炼平台。**大力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四个一线”增长才干、砥砺品质，促进干部成长与工作推进的良性互动。坚持选派干部到建档立卡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等脱贫攻坚一线锤炼，提升干部促进扶贫开发、乡村振兴、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坚持选派干部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融资化债等经济发展一线磨练，着力提升干部引领经济发展、抓区域建设能力；坚持选派干部到信访维稳、政务服务等服务民生一线锻炼，切实提升干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坚持选派干部到疫情防控、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一线历练，增强干部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增强本领，提升干部综合能力素质。**让干部在基层一线、吃劲岗位和情况复杂地方经受训练，锻造过硬本领。切实提升干部在基层一线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具体政策措施、抓好贯彻落实的本领，全面提升干部组织力、执行力；着力提升干部将上级精神与基层实际、地方特色相结合创新开展工作、攻坚克难的本领，推动上级安排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有效提升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本领，切实将群众

满意度作为评价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全力提升干部对风险问题的分析、研判、排查、预防、化解能力，增强干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本领。

**注重考察，创新干部考察识别方法。**成立一线考察工作组，全方位、多渠道、近距离了解干部，确保考精考准考实。强化动态调研，强化蹲点调研，强化跟进督导。

**运用结果，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建立健全重大斗争一线干部单独考核评价，单独评定等级机制，以考核结果推动干部能上能下。选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时，把参与重大斗争经历作为考察重要条件；对在重大斗争中主动请缨、勇挑重担、表现突出、作出贡献的干部，在评先选优、职级晋升、提拔重用上予以倾斜；对在重大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通过学习会、表彰会、新闻报道等大力宣传表彰，对重大斗争一线先进典型事迹进行重点宣传，以事感人；对在重大斗争中应战不力、失职失责的干部，取消年度评先选优资格，坚决调整岗位、严肃追责问责。

**强化保障，持续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切实保障在重大斗争一线干部相关待遇。建立关心关爱、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落实好干部带薪休假、健康体检等保障措施，对在艰苦困难地区和奋战一线的基层干部，在落实补贴、绩效奖励等方面给予倾斜；定期开展谈心谈话，帮助干部解决思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把“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具体化。

（作者为贵州金沙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摘自2021年1月14日《组织人事报》）



#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杨英锋

作为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鲁山经过不懈奋斗和持续攻坚，于2020年2月实现脱贫摘帽，全县184个贫困村全部出列，40805户、14292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要回归新的起跑线，瞄准新目标新任务，接续奋斗，推进各项工作全面提升。

从产业扶贫向产业兴旺提升。脱贫攻坚工作中，为了促进群众增收，发展了一些短平快的产业，在实现贫困村、贫困户脱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振兴中，要树立现代农业发展的理念，把产业发展从简单的产业扶贫模式转换到产业兴旺的思路上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打造产品品牌，着力打造中原蓝莓第一县、中原香菇第一县，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乡村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从补齐贫困村短板向全覆盖提升。在脱贫攻坚阶段，重点是补短板，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主要向贫困村倾斜，在非贫困村投入上相对不够。推进乡村振兴，要适应发展的新特点和群众的新期待，着力在扩大覆盖面、提升整体水平上下功夫，统筹推进各村协调发展，逐步实现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目标。

从注重第一产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要针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围绕“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等抓手，着力在延伸产业链条、打响农业品牌、激发产业活力上下功夫，实现区域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科学化、信息化发展，形成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

的格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从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坚持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国家文明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县三个创建，打造装备制造、防疫物资、新能源、鲁阳工业园四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形成工农互补、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是个长远目标和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要抓好关键重点，科学谋划，有序推进，要做到，坚持规划先行、因村施策；坚持突出特色、提升内涵；坚持农民主体、共建共享；坚持固本强基、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要强化党的领导，建立有效机制，确保高效有序推进，要做到，建立领导机制，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建立考评机制，营造良好氛围。

乡村振兴是新发展阶段的重大任务，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总部署，创新思路，提升成效，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为河南省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鲁山县委书记）  
（摘自2021年1月18日《中国县域经济报》）

##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高级党校，其旧址共有两处，分别位于瑞金市叶坪乡洋溪村满太屋刘氏私祠和云石山乡社公背侣玉公祠。

1933年3月13日，为培养大批苏维埃干部，在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前一天，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市叶坪乡洋溪村满太屋正式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弼时、张闻天先后任校长，杨尚昆、董必武先后任副校长。校址初设于叶坪乡洋溪村满太屋刘氏私祠，同年4月迁至下肖区（今沙洲坝镇）黄竹堪下新厅村，1934年7月再迁至田心乡（今云石山乡）社公背侣玉公祠。10月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先后开办了3种类型的训练班：新区工作人员训练班，主要培养新苏区（含白区）工作人员，学员80人，学习时间1个月；党政工团干部训练班，分别设党团、苏维埃和工会干部各1个班，每班50人，学习时间4个月；高级干部训练班，主要训练各省委、省苏维埃和省工联派送的高级干部，学员40人，学习时间6个月。课程设置因班而异，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西方革命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许多课程都请中央领导同志讲授。如毛泽东讲

授苏维埃运动史，任弼时、邓颖超讲授中共党史，博古讲授联共（布）党史，董必武讲授西方革命史，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李德讲授军事课，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顾作霖也常到校讲授有关课程。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叶坪）旧址又名满太屋刘氏私祠，属晚清建筑，砖木结构，悬山顶，坐北朝南，宽5间，深2间，占地731平方米。2005年7月，被列为赣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3月，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云石山）旧址又名社公背侣玉公祠，属晚清建筑，土木结构，坐南朝北，宽3间，深2间，占地473平方米。2018年3月，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摘自《党史文苑》，2020年第12期，原题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



# 张太雷——打破旧世界的惊雷

丁佳文

走进天津大学校史馆张太雷纪念室，在大约60平方米的空间中，集中展示了120余幅历史照片和一些珍贵物品，物品包括张太雷在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的成绩单、毕业证书等。这些照片和实物真实地记录着这位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者、中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1916年张太雷考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法科，在校用名张曾让，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张太雷，寓意‘打破旧世界的惊雷’。”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太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文杰告诉记者，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张太雷在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做兼职编辑、翻译，并因此结识了在天津的俄共（布）秘密党员鲍立维，这成为张太雷自觉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开端。

五四运动中，张太雷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1920年3月，他加入了李大钊在北大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后，张太雷协助李大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并不断将秘密翻译的社会主义文献送往北京。

1920年10月，张太雷与谌小岑、吴南如等人在天津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中旬，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张太雷被选为书记。会议通过了张太雷起草的团章，该团章明确规定团的宗旨在于“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推动天津、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运动，先后创办《劳报》《来报》，并分发《共产党》等革命刊物，产生较大社会影响，被誉为“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同年冬，张太雷与邓中夏

等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前往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努力提高工人文化水平，阐明工人阶级受压迫的社会原因及抗争的方法，启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骨干。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活动持续了约3个月的时间，即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时间虽短，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与组织工人运动、团结教育青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以后天津党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在天津的5年时光里，张太雷打下了扎实的学识基础，培养和锻炼了卓越的组织才能，确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完成了由一个求知、爱国、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向一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者和领导者的转变。

以天津为起点，张太雷开启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旨在谋求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之路，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且为现代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为《天津日报》记者）  
（摘自2021年1月27日《天津日报》）

# 新中国“一五”计划的诞生历程

吴跃农

新中国诞生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新中国领导人殚精竭虑思考和迫切解决的主要问题。1951年春，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历时四年、六易其稿。“一五”计划是我们党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在我国历史上属首次。

## 毛泽东首次提出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当时，我国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并且相关技术人才极为匮乏。毛泽东、周恩来深知领导全国人民大展宏图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951年2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毛泽东同时提出，我国工业发展的中心是重工业。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并要求立即开始编制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作。经周恩来提议并经会议决定，成立六人领导小组，负责“一五”计划编制工作。小组成员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

## 周恩来领导组织“一五”计划的编制

1951年11月的新中国第一次计划会议，明确中财委是国家最高计划领导机关，其计划局是工

作机构，并向各地布置了编制计划任务。会后，“一五”计划试编在全国范围展开，年内完成试编一稿。

1952年5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但党中央紧抓经济工作不放松。根据中财委建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中财委根据党中央会议精神，确定了“一五”计划编制总体指导思想：经济建设要确实保证重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物力、人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且配套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6月，中财委开始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全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8月11日，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以及《总说明》试编完稿。尤其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一五”计划方针、各项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等作出系统阐述，使“一五”计划蓝图框架更加清晰。

“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实际上只有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铁路运输、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计划，约占40%，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间接计划。并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作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

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布局。同时，周恩来还起草了《关于3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5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

尽管“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比较粗略，但作为我国首个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雏形，为即将展开的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也为中国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提供了基本依据。

### “一五”计划历时四年、六易其稿

1953年6月，国家计委结合苏方意见和援助情况，对“一五”计划轮廓（草案）进行初步总结和修改，尤其是要求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这是第二稿。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写信：“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2月12日，中央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八人工作小组，陈云任组长。毛泽东下了“军令状”，要求从2月15日起，用1个月零5天时间拿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在周恩来指挥、陈云主持下，3月20日粗稿完成，4月初形成《五年计划纲要（初稿）》。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初稿，逐行逐句圈点，作了许多批注，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审阅。这是第三稿。4月22日起，陈云开始主持八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中的间接计划、主要内容、投资比例、购买力与物资平衡、财政收支紧张、工农业指标能否完成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一五”计划的检验提出四条标准：一是苏联援建项目能否如期完成；二是确定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否实现；三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四是市场是否稳定。6月底，陈云就《五年计划纲要（初稿）》的有关问题向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重点阐述了编制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即“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原则。

第四稿编制工作，因陈云生病在外地休养，由计委主任高岗主持。第四稿确定了“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

10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先后离开北京到达广州，用近一个月时间，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进行审议修改。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时11天，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随后，中共中央将这个计划草案发给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讨论，并要求各省委特别注意本省的农业发展计划。

1955年2月下旬，“一五”计划草案汇集各方意见，增加地方计划一章，完成了第五稿。3月21日，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对“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实施的社会经济基础、工农业建设规模等重要问题作出说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审议，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4月至5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党代会提出的意见，吸收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意见，参考苏联建议，对计划草案进行最后一次修改，即第六稿，由原来的12.7万字减少到10.4万字。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

至此，“一五”计划历时四年、六易其稿，终于编制完成。

（摘自《红岩春秋》2020年第12期）

# 假如林黛玉有中年

海 龙

几百年来，读《红楼梦》，人人都为黛玉个性的纤尘不染而感动。她涓洁得不像尘世中人，而像一个仙界的奇葩丽姝。黛玉生性是这样“喜洁难寻偶”，我们很难想象她会结婚、生孩子，或她也会有柴米油盐的烦心事。

其实，在现实世界中，真的有个结婚以后的林黛玉。通过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敏感、飘零和羸弱的才女在离乱、奔波和动荡世道中是怎样挣扎、生存的。这个人物，就是剧作家曹禺女儿万方写的长篇纪实作品《你和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女主角、她的妈妈、曹禺的第二任妻子方瑞。

方瑞是清代著名金石书法大家邓石如六世孙女。其母亦系出名门，是桐城派散文名家方苞后代。她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因其幼时娇弱，家里不舍得她入学，引名师在家培养教育。方瑞没读过大学，但文化素养优异，工诗善词；书法绘画也都有非凡造诣。方瑞从小接触诸多著名学者和诗人、艺术家，故眼界极高。杨振声、邓以蛰、胡适、蔡元培、赵太侔等名人皆点提面教过她，而接触过方瑞少女时代的新旧文人常惊为天人。她是活着的古典美人——美人在这个世上永远不缺，难得的是她那骨子里的气质和阆苑仙葩般的孤高和仙氤。

方瑞的不幸跟黛玉有同有异，但她最大的不幸是生在乱世。可乱世的血泊里也能生长出凄艳的花朵，她一生夙缘是遇到了才子曹禺。经历了沧肌浹髓的爱和无尽的等待，苦恋的销魂和折磨已把她蹂躏到九死一生。但最后，天可怜见，方瑞终于嫁得了有情人。她一生最大的勇敢就是背叛家庭、挑战世俗并为爱情豁出去了一切——为了这一搏，她似乎耗尽了全部的精力和勇气。此后的日子，她只愿

待在家里厮守有情郎，回到琴棋书画当中。

可时代变了，它容不下锦心绣口和卿卿我我。即使不去工作、不走入社会，方瑞却躲不掉时代的摧折。她没能活到晚年。她跟林黛玉一样，都多愁善感，缺少现实感和在乱世生存的能力。而且，她们都吃药甚或仰药为生。方瑞吃的却是致命的药，它能使人一时躲开现实，黑甜一梦；但它也可以使人一觉不醒。就这样，在1974年七月溽热的一个夏夜，她静静地走向了梦里的远方。

又过了好多年。方瑞的故事几乎湮灭了，可万方却不能忘怀妈妈的悲剧。此后的日子，她花了好多好多年来理清妈妈的一生。在《你与我》中，她没有专写她那更有名的爸爸，却把笔转向了差不多“平生未展眉”的妈妈。

万方这样选择、这样写是需要勇气的。写方瑞，必然要写隐私、写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万方没有充当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而只选择了女儿的角度。她想写的，是自己珍贵童年的刻痕、生命的回忆和心灵的倾诉，是大时代的一个侧影，而不仅是一部名人传记。

《你和我》是一部贮满了史料细节和上下文背景的立体回忆。传记和纪实文学的灵魂是真实，作为传主的亲生女儿写父母，这里面的事实和情感能否做到客观真实？读完这部满是血泪的传记，相信读者对之一定能有自己的答案。

（摘自2021年1月27日《中华读书报》）

#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朱光潜

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种，所看出来的现象也就有多种。比如园里那一棵古松，无论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说它是古松。但是，你从正面看，我从侧面看，你以幼年人的心境去看，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异都能影响到所看到的古松的面目。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棵古松。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象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它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

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离开人的观点而言，事物都浑然无别，善恶、真伪、美丑就漫无意义。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观的成分。

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等都是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太不切实用的人物。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需要也是多方。真善美三者俱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人性中本有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以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的状态。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面。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和美人过去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成功和失败也都过去了，只有艺术作品真正是不朽的。

（摘自《谈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 软体机器人令科学家着迷

## 多才多艺

“软体机器人”的吸引力在于其灵活性和通用性。有朝一日它们将在火星表面快速移动，将在人体内最隐秘的部位穿行。另一种可能性是，它们可被用于清理遭遇地震或火灾的建筑物残骸。它们还能被用于修复手术，将它们弯曲、塑形，制成你想要的任何形状。软体机器人由包括纳米材料在内的伸缩性最强的材料制成，能够模拟人体肌肉功能等生物功能。可以说，这些机器人几乎被纳米材料赋予了生命。

问题在于，目前研究人员仅仅触及了软体机器人研究的皮毛。到2024年，其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1.6亿美元。

## 贴合自然

软体机器人更符合自然界规律。在人类经常使用坚硬材料（例如金属或木头）的地方，自然界更倾向于使用柔软却有韧性的材料（例如肌肉和软骨）。人类已开始了解这一点。举例来说，我们越来越多地将液态金属用于3D打印。这种听上去像是来自科幻电影的材料可用于制造贴合不规则几何形状（包括人体）的可拉伸电子器件和可穿戴设备。

液态硅橡胶是另一个最佳的例子，长期以来，这种材料令软体机器人研究界兴奋不已。2016年，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利用这种材料研发出史上首款软体自主机器人“Octobot”。令人惊讶的是，“Octobot”机器人的制作成本比一杯拿铁咖啡的成本还低。而且，只需要花5美分就能为

其装满燃料。可以想象，未来将有成百上千个廉价的软体机器人被派往现场调查，它们将越过障碍物，在狭小的空间里穿行以协助救援。

## 前景广阔

生物学工程师吉娅达·杰尔博尼在2018年技术、娱乐与设计大会上发表演讲称：“研发软体机器人的主要目标不是制造超精密机器，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它们了，而是让机器人能够面对现实世界中意想不到的情况。”杰尔博尼还谈到利用软体机器人技术来研发手术器械（尤其是内窥镜），这样它们就能比传统器械更轻松地在人体结构周围穿行。

同样，碳基钛聚合物可与合成聚合物结合，用于制造超薄人造肌肉。这项技术在韩国科学技术院制作的飞舞的蝴蝶、飘动的叶子、绽放的花朵等艺术复制品中得到了展示。

不过，软体机器人并非没有缺陷。具体而言，科学家们发现，液体致动器——即赋予机器人“生命”的设备——启动缓慢的原因是，它需要大量的液体来驱动，抑或其内部的各种结构（例如管道和阀门）致使液体流动速度放慢。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根据弹出式儿童玩具的物理原理开发一种解决方法。

软体机器人无疑将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人类的想象力有多广，其可能性就有多大。

（摘自2021年1月6日《参考消息》）



# 突聋来袭 如何才能远离

王宁宇

## 突聋爱“找”哪些人

突发性耳聋是指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即在72小时之内发生，且相邻两个频率的听力下降20分贝以上的感音神经性耳聋。一般来说，每种疾病都有自己的好发人群，突聋也不例外。突聋在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生，但40—50岁发病率最高。这个年龄段的人群，身体机能有所衰退，并且承担的工作压力、生活负担普遍偏大，突聋便容易乘虚而入。

## 常戴耳机容易突聋吗

生活中，很多人都离不开耳机。正确佩戴耳机不会导致突聋，但是要注意以下几点：

1.音量不宜过大。2.时间不宜过长。3.尽量避免入耳式耳机。4.不要在噪音环境下戴耳机。

## 突聋治疗要争分夺秒

突发性耳聋是由毛细胞功能障碍导致的，除了突然发生听力下降以外，80%—90%的患者伴有耳鸣；50%的患者出现耳朵发闷的情况；30%的患者会有头晕不适的症状。当你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時候，一定要考虑是否得了突聋。

一旦得了突聋，必须要进行抢救性治疗，越早治疗治愈率越高。总体来说，一定要在三周之内到医院完成治疗。发病一周以内的治疗效果比两周以内的治疗效果要好得多。

一般来说，患者不需要住院，主要通过输

液、口服药物治疗，在门诊就可以完成。对于路途遥远的患者，可以选择住院，免去车马劳顿，有利于疾病恢复。同时，建议这些患者可以前往二级医院或者社区医院进行治疗。

突聋大多都可以治愈，但对于病情非常严重、合并眩晕症状、本身就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患者，治疗效果可能达不到预期，不能完全恢复。此时，患者就需要佩戴助听器了。

## 治愈后也不可掉以轻心

突发性耳聋的规范治疗一般为10天，如果治疗效果不满意可以再进行一个疗程。对于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可以考虑高压氧治疗、中耳激素注射治疗等方法。

突聋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听力突然下降，首次治愈后，不代表致病因素也被消除了，所以突聋是可以复发的。糖尿病、高血压、代谢紊乱、烟酒无度等都是重要的诱发因素。值得强调的是，复发患者的症状往往比第一次发作严重，且治疗难度及恢复时间都有所增加。

生活饮食方面，突聋患者不需要忌口，但是一定要戒烟忌酒。避免熬夜、清淡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当人们因为过度劳累、熬夜等导致突聋时，一定要先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样才能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作者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摘自2021年1月18日《健康报》)

## 2021年1月党内法规要闻

1.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2. 中央军委印发《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支部）工作规定》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工作规定（试行）》

（本刊编辑部综合整理）

## 2021年，这份“民生清单”要收好！

**农业农村部：**奋力夺取全国粮食丰收，稳定生猪生产恢复势头。要奋力夺取粮食丰收，目标是确保总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教育部：**抓好中小学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全面振兴乡村教育，完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推进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终身学习体系。

**住建部：**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强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加快补齐租赁住房短板，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

**财政部：**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保基金管理。加强基本民生保障，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商务部：**促进汽车家电等大件、餐饮、农村消费，建设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鼓励有关城市优化汽车限购措施，增加号牌指标投放。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农村居民购买3.5吨及以下货车、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对居民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

并购买新车，给予补贴。

**交通运输部：**推进实现“刷脸”进站乘车，完成京津冀及周边重型柴油货车淘汰。鼓励和规范发展定制客运。实现20个省份普及道路客运电子客票服务。加快推动智慧交通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交通。

**国务院扶贫办：**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编制村庄规划。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实施村庄道路、农村供水安全、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乡村物流体系建设、农村住房质量提升等一批工程项目。

（记者 舒静等）

（摘自2021年1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

## 浙江：“浙食链”——从田头保障到舌尖

在“浙冷链”保障着进口冷链食品的安全时，浙江正着手打造保护餐桌安全的新链条——“浙食链”，将食品生产至消费的各个流转环节进行数据归集，实现预包装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全流程溯源。目前，全省已面向部分企业和大型商超启动“浙食链”试点。

在原有“浙冷链”系统和“农产品风险智控”场景探索的基础上，“浙食链”系统设计建设包含“一库一码一标四端”。浙江省食品安全追溯数据库是“浙食链”的“大脑”，汇聚了所有企业自建平台上传信息和“浙食链”记录的产品流通信息，使食品从“田头”到“舌尖”的全过程都有迹可循；产品包装上的识别码，则是消费者与“浙食链”的接口，扫一扫便可获取数据库中的相关信息。“浙食链”的应用将让食品安全实现全链条严格监管，形成监管闭环。

（记者 王世琪 通讯员 沈雁）

（摘自2021年1月21日《浙江日报》）

## 江西：首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

1月8日，南昌市人社局向首批49位农民颁发职称证书，其中，10位农民取得中级职称，39位农民取得初级职称。据悉，这是江西省首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这些获得职称的“田秀才”将被纳入乡土专家库，作为各种培养、扶持与服务的重点对象，更好地发挥其作为乡土专家的作用。

农民职称评给谁、怎么评？南昌市首次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主要面向试点县——南昌县农业生产第一线符合申报条件的职业农民，如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及返乡创业大学生、“农创客”等群体。共设置农艺、畜牧、水产3个专业，涵盖中、初两个级别。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破除学历、资历、论文等条件限制，以能力业绩为导向，将申报人员工作实绩、技术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创造社会效益、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实绩作为主要评价依据，突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示范带动能力。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的方式也更加接地气，采取实地查看、业绩展示、测试答辩和综合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并制订了相应的评分细则。

（记者 郑荣林 实习生 毕婧）  
（摘自2021年1月10日《江西日报》）

## 四川：出台《四川省市县重大经济事项决策规定（试行）》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四川省市县重大经济事项决策规定（试行）》，对市县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范围、决策程序、决策要求、决策执行和监督等作出具体规定。

《规定》将重大经济事项主要划分为经济政策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公共资金管理、政府投

资项目管理、招商引资、国有资源管理、国有资产管理6个方面、33项。

《规定》强调重大经济事项应当深入开展调研，进行论证和合法合规性审查，充分征求意见，并由党委常委会会议、政府常务会议或党委全体会议、政府全体会议集体研究决定，不得以个人签批、口头同意、会签或以专题会议、议事协调机构会议等方式代替党委、政府集体决策。

《规定》提出了应当遵守的要求，并作出不得违规融资担保和变相举债、不得在政府投资项目中以公开招商方式代替公开招标、不得违规低价供应土地和返还土地出让金、不得违反规划随意批准或变更建设项目的规划条件等禁止性规定。

（记者 任鸿）  
（摘自2021年1月27日《四川日报》）

## 云南：“云菜”直达粤港澳大湾区

日前，满载新鲜蔬菜的冷链车从昆明出发，驶向1300公里外的粤港澳大湾区，云天化现代农业公司种植的蔬菜将直达大湾区民众的餐桌。

2020年9月，云天化现代农业公司与云南农鑫农业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在云南高原种业小镇建立了合作试点项目，项目获得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认证，可向大湾区直供云南高原特色蔬菜。此次首发的蔬菜主要是白菜、萝卜等，价值约250万元，未来计划每年直供蔬菜3万吨。

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特有的种植优势，云南已成为“南菜北运”“西菜东输”“外销出口”的重要基地，其中，粤港澳大湾区也是云菜出滇的重要市场。目前，云南省已有7个州市的22家企业获得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认证。

（记者 杨建华）  
（摘自2021年1月15日《云南日报》）

把握时代脉搏 了解大政方针 关注热点焦点 交流为政经验

为党政干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党政干部参考》



欢迎订阅 《党政干部参考》

## 汇款方式

### 邮局汇款

邮 编 100091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综合楼

收 款 人 《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国内刊号CN11—5922/C，邮发代号2—490  
月刊，全年12期

零售价25元/本，订阅价240元/年

联系电话：010—62805451

传 真：010—62808900

邮 箱：cankaocps@126.com

### 银行汇款方式

户 名 《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账 号 11050163360000000623

开户银行 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ISSN 2095-6142

